

第一章 峇峇的語言使用

要瞭解峇峇人的語言使用狀況，或許我們可先從一位 1920 年代曾到過南洋的中國作家梁紹文的遊記內容，得到一些印象¹，例如在第 68 篇〈馬來化的中國人〉一文中，作者便敘及他到馬六甲後，在當地的華人朋友沈鴻柏的帶領下，拜訪了荷蘭街峇峇陳思福的住家，據思福介紹：

他的遠祖來到馬六甲，至他本身已經是八代了，以年數來算，最少也有四百多年；他原籍是福建人，但是現在連**福建話**也說不出來，平日在家裡所講的是**馬來話**，在社交所用的是**英語**。禎祿和他都是一樣！最怕的是講中國話；還有那生意來往的中國字他不但不用他，連見面也怕見得。…²

之後再到街坊陳禎祿家參加喜宴，席間：

我同席的幾個人除了沈鴻柏外，都不會講中國話，他們自己嘍哩咕嚕的都是馬來話；我有時間他們一句，他們就答一句英國話。³

另外在第 69 篇〈辛苦了曾江水〉一文中，作者敘述道：

曾江水雖然在馬六甲八九代了，但他仍能講些福建話，較之禎祿思福半句中國話都不會說的，這未嘗不是『彼善於此』呢？……沈鴻柏和他用福建話嘍咕了一會……可惜我一句福建話都講不出，他亦半句普通話都聽不著！大家相對無言……⁴

從作者旅遊的時間（1920 年代）來看，這時候正接近峇峇社會文化發展最精粹完整的全盛期⁵，因此，這幾段旅遊記錄，便適切的為我們勾勒出一副正統（true-blue）峇峇人的語用表形圖：即峇峇在家庭用語及民族語言是峇峇馬來語，在社交場合及對外則多用英語；至於漢語，除了少數仍會講傳自父系的福建話外，會講外來語「普通話」及看得懂漢字的峇峇人，在新、馬獨立以前，不能說完全沒有（詳見本章第二、四節），卻也是非常罕見。

當然，從作者的敘述看來，其遊記是充滿「異國情調」的⁶，以上圖像雖與

¹ 詳見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關於作者的旅遊年代，在第一篇〈海上生活的第一次〉中便有提及：「我動身的時候，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回程的時間則不詳。但是，細讀本書便可以知道，這是一次漫長而有深度的旅遊，從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馬來半島及緬甸，到荷屬的印度尼西亞，作者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大半個東南亞。該書主要抒發作者對沿途風土民情的所見所感，尤其對當地華社的生活狀況，著墨頗多，為二十世紀初期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留下了「即時」的記錄。

² 引自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頁 146。禎祿，即指敦陳禎祿（Tun Tan Cheng Lock, 1883-1960），出身於顯赫的馬六甲峇峇世家，為馬來西亞華人的最大政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簡稱馬華公會）第一任總會長，也是馬來(西)亞建國過程中的國家領袖之一。

³ 同上，頁 148。

⁴ 同上，頁 149-150。

⁵ 從筆者與峇峇人的接觸經驗來看，峇峇一般都認為，1830s~1930s之間的歲月，是他們社會文化發展的「黃金年代」，而一般研究者的看法也與這相去不遠。

⁶ 例如作者敘述在酒宴上與自以為是自己「同胞」的峇峇們同座，但在語言及飲食習慣等文化展演上兩者卻始終顯得格格不入，作者還稱他們是馬來化的「中國人」，但事實上當時的峇峇大都自認是本土之子（Sons of the Soil）或大英子民（或英皇華人，King's Chinese）。又如該作者會認為，峇峇曾江水會操少許福建話，較之那些只會講馬來話的峇峇，是「彼善於此」。（詳見梁紹文，同上，頁 148-150）可以說，作者的行文是「異族視界」的產物。

峇峇人當時的實際語用情形相去不遠，我們卻不能僅此拍板定案，畢竟我們無法排除許多客觀因素會為現實帶來變革的事實，況且峇峇內部也因各人與異文化之間的「親疏關係」而有不同的語用經驗及民族體認。因此，以上情形只是一個「歷史橫斷面」的寫照，要真正瞭解峇峇的語言使用情形，我們也必須從峇峇所處的歷史發展背景去看，其輪廓才會更清楚。以下我們便逐步來瞭解幾個峇峇的主要語用經歷。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

峇峇人的母語 (mother tongue) 或內部交流語言，就是峇峇馬來語 (Baba Malay)，這是研究者給予的稱謂，而峇峇人自己也都認可⁷。因此，可以說，峇峇馬來語是在界定峇峇時的最主要特徵⁸，在早期，它更是用來區別土生「峇峇」華人與新近移入的「新客」華人的重要依據，即便到了現代，一些不明就裡的華族中心主義者仍會因他們以 (峇峇) 馬來語而不是漢語為日常用語而戲稱他們是“OCBC” (Orang Cina bukan Cina，即不是華人的華人)。⁹

據了解，Baba Malay 一詞最早由英國學者 Rev. W. G. Shellabear 提出，在他於 1913 年發表的一篇相關文章中，便已明確的表示：

Malay as it is spoken by the Malay-speaking Chinese...is quite a distinct dialect, the prevailing characteristic of which is its tendency to follow the Chinese rather than the Malay idiom. It is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words which have become assimilated with this dialect is not very large, and that many words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English, Portuguese, Dutch and Tamil, and from other neighboring tongues, but it is rightly called 'Baba Malay', for it is largely the creation of the Baba Chinese, and it is their mother tongue so that it

⁷ 峇峇馬來語 (Baba Malay) 算是較公認的用法。可是，在峇峇生活圈子裡，他們也會管自己的話語為“chakap Melayu”(講馬來話)、“chakap Peranakan”或“chakap embok-embok”(embok為爪哇語「母親」之意，單字重疊表示複數。)

⁸ 例如：新加坡語言學家的 Anne Pakir (本身為娘惹) 認為：“Baba Malay is not an official language and i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a language of the home...is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Peranakans...”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Peranakans”, in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 xv.)

陳志明 (Tan Chee Beng) 及 Jürgen Rudolph 等人也一致認為，峇峇馬來語是峇峇認同的象徵，直到今天即使只會說一點點的峇峇馬來語，他們也會以此為憑據認定自己是峇峇人。(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Baba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 1988), pp. 139-141;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34-335，此外新加坡語言學者云惟利也有相同看法：「峇峇人的身份，主要系于其語言。峇峇話是他們自成一族的重要象徵。一旦失去這個象徵，就失去了他們的民族特色。」見〈第十一章：峇峇話〉，《新加坡社會和語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1996)，頁 193。

⁹ 這情形最初是筆者在 2003 年 2 月在馬六甲田調時，由當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賴碧清小姐口中得知，詳情亦可參：Anonymous, “The agony of being an OCBC”, *Sun Magazine: Dialogue, Malaysia: The Sun*, 30 September 1996, p. 2。OCBC為新馬主要華資銀行——華僑銀行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的簡稱。在新、馬兩國，由於華族人口眾多，華人可隨興的講自己的母語 (漢語)，也因此，主體華族內部一直都沒有華人之間以馬來語交談的習慣，也因此，這群口操馬來語的華人，才會顯得突兀。

belongs to them in a sense and no other people can or do claim it as their own.¹⁰

(譯文：說馬來語華人所說的馬來語…是一種頗為特異的方言，它顯著的（語言）特性更趨向於漢語，而非遵從馬來語的習性。事實上，該方言中所吸納的漢語詞彙數量並不是很龐大，而且它也有許多借自英語、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淡米爾語，甚至其他鄰近語言的詞彙，不過，稱之為「峇峇馬來語」是恰當的，因它主要就是峇峇華人創造的，而且是他們的母語，因此在某個意義上它是屬於他們的，並且沒有其他人（族）可宣稱這是他們自己的語言。)

這段話清楚的點出了峇峇人和馬來語之間的牽連，以及它融合各族語言詞彙的混雜性；而峇峇人之於峇峇馬來語的開創性，也是無庸置疑的。

一、峇峇馬來語的誕生(1800 年以前)

談及這個「混合語」，則不得不先從峇峇人的原鄉馬六甲談起。馬六甲，早在馬六甲王朝時期（Sultanate Malacca, 1405-1511），就已是一個國際貿易中心，當時該地的居民，除了馬來人及其他馬來半島原住民外，也包括了中國人、阿拉伯人、爪哇人、暹羅人及印度人等，形成了多元民族混居的世界性社會（cosmopolitan society），估計當時流通於馬六甲的語言就多達 84 種¹¹。然而，由於政經及軍事大權皆掌握在馬來人手中，加上人口數的絕大多數，馬來語不僅成為當時的官方語言，也順勢成為當地各族間的共通語¹²。然而，我們必須正視的一點是，當初遠道而來經商的各族商人，不可能立刻就學會原汁原味的「標準馬來語」（Standard Malay or High Malay），而經常有機會與外族交流的馬來人必定也會嘗試以較淺顯的白話與他族對談；因此，在實際的溝通情境中，所謂共通的「馬來語」，其實就是一種雙（多）方在切實交流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較為折衷易懂的「通俗馬來語」¹³。交流日子越久，自然的馬來語也開始受到各族本身的

¹⁰ 引自：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 51. (本文亦附錄於：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53-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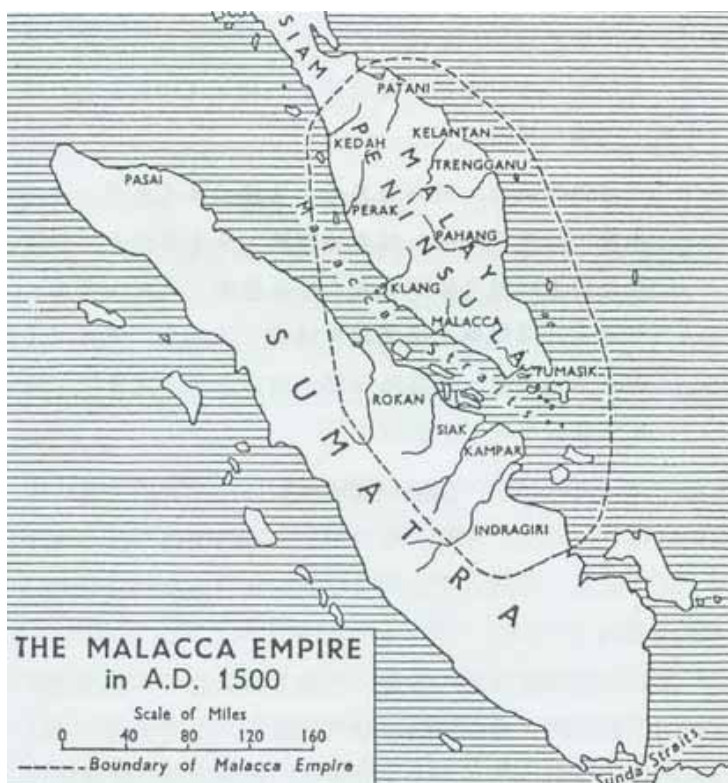
¹¹ 參見 Muhammad Yusoff Hashim, "Masyarakat Melaka Zaman Kesultanan dan Sifat Kosmopolitannya", *Me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1400-1980, Volume I*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13-114.

¹² 這點可從世界第一部馬來語詞典《滿刺加國譯語》於 1403 年（時值中國明朝永樂元年，接近鄭和初出使馬六甲的 1405 年）出現得到證明。早期中國為與馬六甲王朝建立友好關係，也方便與當地各族對話，則必須學習馬來語或有會馬來語的通譯作為溝通的橋樑，則該部採用漢字語音拼寫的馬來語詞書便是最好的工具書。學者楊貴誼研究書中所收詞彙的語音註釋，認為編寫者肯定不是道地中國人、或完全不諳該種語言的人，而可能是「新客華人」（楊指謂那些非土生土長、在土生華人誕生以前或以後落戶的外來華人），筆者亦認同此點。參見楊貴誼〈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七：新客華人克服語文難題的妙方〉《資料與研究》第 27 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5）。詳情另參：Blagden, C.O. "A Chinese Vocabulary of Malacca Malay words and phrases collected between AD 1403 and 1511(?)"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 pp. 715-749;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Sdn. Bhd. 1993), p. 35. 第伯符輯、火源潔譯《華夷譯語：滿刺加館譯語》（台北：珪庭出版社，1979），頁 425-466。許雲樵，〈滿刺加國譯語注〉，《南洋學報》，1941 年 3 月號，頁 63-89。

¹³ 由於這種「通俗馬來語」正是產生於商場，因此也被喚為「市場馬來語」（Bahasa Melayu Pasar），

語言影響，所以至少在 17 世紀時，當地所流通的馬來語其實已經跟「純馬來語」(Pure Malay Language)有所差別¹⁴，而是傾向於口語化的「通俗馬來語」(Bahasa Melayu Pasar市場馬來語，或稱Bahasa Melayu Rendah低級馬來語)。並且隨著馬六甲王朝勢力的擴張，馬來語的通用性也幾乎涵蓋了大半個馬來群島。換句話說，在馬來群島各大港口中，不同民族用以溝通的語言是「通俗馬來話」，而不是馬來人自己內部之間使用的高級馬來語。

圖 1-1：馬六甲王朝疆域圖



資料來源：Joseph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2), p. 13.

隨後，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分別於 1511 年及 1641 年佔領馬六甲，但由於這些殖民者僅志在經濟利益的取得，對於推動馬六甲境內各民族的語言及教育政策並不積極，也沒有制訂統一的語言政策，因而這段期間，馬來語的地位不會受到摧

並且由於它的詞彙不純及語音不正，被認為是相對於「標準（高級）馬來語」的「低級馬來語」(Bahasa Melayu Rendah / Low Malay)。然而，所謂「高級」、「低級」是一種相對的概念，級數高低並不妨礙它作為一種「語言」存在。

¹⁴ 也有稱之為「古典馬來語」(Classical Malay)，或稱「高級馬來語」(High Malay，相對於市井馬來語而言)。十七世紀以前，馬來半島的馬來人大部分都住在市郊或內陸偏遠地區，事實上除了極少數住在城市地區的馬來人之外，絕大多數的馬來人很少有直接與前來經商的外族互動的機會，也因此，所謂的「純馬來語」除了是生活用語，它也一直是馬來文學的書面語，很少受到外語的影響；而唯一較明顯的改變，則是因應伊斯蘭教的傳播而吸納的阿拉伯語詞彙和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爪夷文」(Tulisan Jawi)）。

毀，而通俗馬來語則繼續通行。換個角度看，在英國勢力進駐以前，馬六甲各族的語言使用與交流其實是非常自由的，並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約束，而「峇峇馬來語」也正是在這種放任的環境中催生的¹⁵。經分析歸納，促成「峇峇馬來語」產生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人口的相對弱勢：

早年在當地的華族等外來人口相對馬來人而言，僅是非常少數，因此，這些弱勢民族在日常生活互動與商場交易上，往往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嘗試用較強勢的馬來語作為溝通工具。當然要這些成年的華族移民，用他們已定型的發音器官去說他族語言，在發音上就很難字正腔圓，尤其這些南來的漢人，大部分來自福建漳州府與泉州府各縣，因此我們可以想像，早期馬六甲的（外來移民包括）華人，雖能以「通俗馬來語」溝通，但他們的馬來語必定更受本民族語言的詞彙、語感及口音所影響，而獨具（例如 Holo）特色。然而，這種怪腔怪調的「任意性馬來語」，要成型為某族語言，還有待社會環境的配合，例如峇峇人便是透過「家庭」這個關鍵性的社會因素，使口音得以代代相傳。更確切的說，民族根源於家族，則民族語言的形成也起於「母語」的凝結。

（二）知識水平偏低：

早期南來打拼的漢人，多為勞工、小商人或農夫，教育程度偏低，甚至有很多是文盲，深處異鄉日久，在沒有文字的支撐下，其本身的民族語言很容易丟失。正如前文所言，十六、十七世紀當華人出現在馬六甲時，馬來語已是當地的通用語；舉凡官訪外交、經商交易等，馬來語是當地各民族之間理所當然的聯絡語。這些華人在當地定居越久，本民族的語言則會因「年久失修」而漸漸淡忘。當然，其後代也無法自家庭生活中已經改說馬來語的父親處習得漢語，更別說認得漢字了。

（三）與當地原住民女子通婚的影響：

早期華族男子與當地婦女通婚，對華人社會最明顯的影響便表現在語言的涵化上。由於這些原住民婦女不會講漢語，婚後華人丈夫不得不以馬來語和妻子溝通，另一方面，即使這些妻子非族屬馬來民族，大部分有可能是來自印尼，以爪哇語、峇達語等為主的原住民婦女，但對外他們也必須嘗試以馬來群島共通的市井馬來語為溝通工具。婚後，由於這些華人丈夫未能完全掌握馬來語，馬來話使不動時，便自然混用漢語的詞彙（甚至

¹⁵ 不僅語言，即使民族事務也是如此，近乎各自為政。例如馬六甲王朝時期，馬來蘇丹便已委任當地華人擔任四個港務官（Shahbandar）中的其中一職，專責接待來自中國與印度支那的商船。而葡、荷統治時期，則直接委任華人甲必丹（Kapitan or Captain）處理華人社會一切事務，殖民政府基本上不太干涉「華人內政」。因此，各族長期的接觸交流，也經常是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社會環境下進行的。

夾雜馬來語及Holo語以外在當地出現過的語詞)，而馬來語和Holo語的混合，便在夫妻的日常生活中發生。¹⁶既然馬來語成了通婚夫婦的「家庭語」，孩子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耳濡目染，加上都由講馬來話的母親撫育成長，便自然而然的學會了馬來語。久而久之，隨著這些講馬來語，卻秉持華人文化與生活習慣的通婚家庭日漸增多，一群以獨特腔調馬來話為母語的華人便順勢產生，自成一個民族集團。

語言是溝通思想的工具與文化載體，當異質的文化之間因頻繁接觸而產生涵化的情形時，也必然會體現在語言上，以混合語的產生為例，便是雙方文化概念與符碼輸入（或交換）的結果。再來，當文化的不斷發展促使語言日趨豐富與縝密時，混和式峇峇馬來語的成熟，也開始彰顯這群人自成一體的文化特質，一群講「峇峇馬來語」的華人民族團體於焉誕生。總而言之，峇峇馬來語的出現，應早於峇峇社會（主要是民族認同的區隔）的具體成形。峇峇魏天福（William Gwee）及德國學者Jürgen Rudolph等人皆認為，只有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峇峇」此一標籤才開始與那群「通婚的後代」掛勾，據此推斷，則時間大概在1819年以前。¹⁷換句話說，峇峇馬來語及文化大致形成於十八世紀，而峇峇認同及族團的具體成形，則始於十九世紀初期，當大量的華工被英國殖民者引入後，「峇峇馬來語」完全凸顯了他們的「與華不同」。

二、峇峇馬來語的發展（1800年至1942年）

踏入十九世紀，這群世代定居馬六甲，並在馬來群島土生土長的「華人」，在語言及生活習慣上馬來化的特性，明顯的與後到內部只講漢語的「新客」華人形成反差，而自成另一支不同的華人群體。而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早期，峇峇社會流行的「族內婚制」及新客「入贅」娘惹家的婚俗，更增強了峇峇人內部的凝聚力，峇峇馬來語的使用人口也不斷在增加。

英國於1824年正式取得馬六甲統治權，隨後於1826年將它與檳榔嶼（1786年取得）及新加坡（1819年取得）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即當地華人俗稱之「三州府」）。英國統治者積極開發新加坡及檳榔嶼成為自由貿易港口，輔以農業開墾，帶來無限商機，促使馬六甲峇峇紛紛移居這兩個新天地，峇峇馬來語也隨之向南（新加坡）、北（檳城）傳播¹⁸。

¹⁶ 由於這些來自印尼群島的原住民女性的參與，加上當時前來經商的大批印尼商人頻繁與交易活動，峇峇馬來語相較於「標準馬來語」和半島內其他的馬來方言，則吸收了更多的印尼語（廣義）詞彙。

¹⁷ 參見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p. xxvii-xxviii;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 311.

¹⁸ 其時馬六甲的貿易港地位已因荷屬時期不當的政策、港口淤塞致大商船無法停泊等因素，而日漸衰退。三地的發展情況就如英國學者D.G.E. Hall所言：「新加坡以驚人速度發展，檳榔嶼的發展比較適中，而馬六甲則停滯不前。」（參見D.G.E. Hall原著，張奕善譯，《東南亞洲史》，下

另一方面，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尤其住在市區的峇峇，因有機會和英國人直接接觸，加上殖民化英語教育的結果，峇峇人學會了英語。憑著掌握雙語的能力，並且瞭解馬來半島社會文化的優勢，峇峇成了歐洲商人與內陸原住民之間的中間人 (middleman)。由於語言的隔閡，使英國殖民政府無法從殖民地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峇峇也因此順理成章的成了英國殖民政府迫切需要的「合作對象」。憑著中間人的身份，周旋於各族之間，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峇峇商人可以說掌控了整個海峽殖民地的地方貿易，其經濟勢力甚至延展至馬來聯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地區¹⁹。隨著峇峇產業網絡的擴張，峇峇馬來語也儼然成了當時馬來半島的商業語言²⁰。峇峇馬來語遍佈的足跡有多遠？看看當年峇峇馬來語出版品的行銷範圍便能知曉，例如《土生華人之星》(Bintang Peranakan, 1930-1931)，其銷路不僅止於海峽殖民地或其他馬來半島的主要城市，也包括隔海的古晉 (Kuching，在今的砂勞越州)、納閩地區 (Labuan)、廖內群島的丹絨檳榔 (Tandjung Pinang) 及印度尼西亞的Semarang，甚至曼谷²¹。換句話說，峇峇馬來語雖蛻變自市場馬來語，但由於峇峇人經濟勢力的擴張及社會地位的鞏固，此時它已成功跳脫並取代了原有的市場馬來語²²，成為馬來半島 (尤其海峽殖民地) 各民族之間日常生活溝通及經商時的通用語²³。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初期這段峇峇人的黃金歲月裡，由於受到英國統治者的器重，峇峇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相較其他民族而言是超然的，優裕的城市生活更加重了他們的優越感²⁴，因此，峇峇人雖以「馬來語」為母語，但大部分峇峇人本身卻不屑於講純正的「標準馬來語」。這個在語言學者或歷史學家看來，或許是更為優雅的語言，在峇峇人看來，卻只是粗俗的山地馬來話 (Melayu Hutan)。

冊 (台北：國立編譯館，1982)，頁 603。

¹⁹ 馬來聯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於 1896 年成立，統轄地區包括了霹靂 (Perak)、雪蘭莪 (Selangor)、森美蘭 (Negeri Sembilan) 及彭亨 (Pahang) 四州。有關峇峇人在經濟上的強勢，可參考崔貴強，〈戰前新加坡華族史的特徵〉及〈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巨商〉，載入《新馬史論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

²⁰ 參見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in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55-156.

²¹ 當然這樣的峇峇馬來語雜誌能出銷到這些地方，也說明了這些地方「海峽殖民地」以外的地區，有少部分峇峇人存在。詳見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3), p. 42.

²² 要釐清「市場馬來語」(Bahasa Melayu Pasar) 與峇峇馬來語之間，個人認為，可透過以下公式去思考：

I. 市場馬來語 = 馬來語 (主) + 其他語言 (如：爪哇語、巽他語、印度語、阿拉伯語、漢語、葡語、荷蘭語等)

II. 峇峇馬來語 = 市場馬來語 + 漢語 (尤其 Holo 語) + 其他 (英語等)

²³ Rev. W. G. Shellabear, 同註 20, 1980, pp.155-156; Tan Chee Beng, 同註 21, 1993, pp. 38-41;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12-313;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Singapore: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1969), p. 105.

²⁴ 正如 Maurice Freedman 所述，十九世紀的峇峇華人成為華人社會的優越階級 (Superior Stratum)，在經濟與政治上支配了海峽殖民地的華人社會。(參見 Maurice Freedma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65), p. 11.)

峇峇馬來語雖自「低級馬來語」(即市場馬來語)演變而來,但峇峇人常自認哪是有教養、文雅和高貴階級的象徵²⁵,若講標準馬來話只會貶低自己的身份,因那畢竟是鄉下地區馬來人講的「土話」。雖然如此,個人認為,峇峇人不講「純正馬來語」,這或多或少也和當時峇峇馬來語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地位有關,在語言的趨利性驅使下,當時的馬來人在對外交流時,甚至必須捨棄自己的語言,而改以大家都懂了的峇峇馬來語和峇峇人溝通,正如Lim Hiong Seng在1887年記錄海峽殖民地馬來口語使用情況時所呈現的,峇峇馬來語尤其是商人和本地工人階級中最廣泛易懂的溝通媒介,包括那些住在城市或時常與公眾互動的馬來人,通常都以峇峇馬來語和他族交流。作者甚至觀察到,即便是馬來社會中最高階層的馬來人,也經常是以通俗的「峇峇馬來語」而非「標準馬來語」和峇峇人交談²⁶。由此可見,峇峇人在自己的語言訂定了之後,根本沒有必要也沒有機會深耕「純正馬來語」。總而言之,直到十九世紀結束,峇峇馬來語不僅是峇峇人的母語,至少到1870年代為止,也被學校用來作為教導峇峇及其他民族學童英語的教學媒介語²⁷,而這也更彰顯了它作為海峽殖民地各民族之間主要溝通工具的地位²⁸。

值得一提的是,或許是由於英文教育的間接效應,這時期的峇峇人開始懂得以羅馬拼音的方式去記錄自己的語言。這時期的峇峇馬來語,其地位不僅是在口語上晉升為「交際語」,從峇峇馬來語文學作品及出版刊物曾經在這段時期(約1890~1950年)出現並蓬勃發展的事實,也證明了,峇峇馬來語透過「羅馬字母」的展演,已成為峇峇人生活裡重要的「書面語言」。其時峇峇馬來語的使用率有多高?從這段期間(1889-1942)廣泛流傳以峇峇馬來語書寫的中國通俗翻譯小說及報章雜誌便可窺見一二。

在殖民者權力介入後,英語地位的日漸提高及英語教育推展的漸趨成熟,確實對峇峇馬來語的生存造成極大壓力。然而,直到新馬史上第一間女校,即新加坡華人女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於1899年成立,並開始讓娘惹們接受英式教育以前,英語儘管是大部分峇峇男性社交生活中重要的「交際語」,

²⁵ 例如, Lim Hiong Seng在1887年發表的文章中,便強調,峇峇馬來語雖被那些中國出生的華人、吉寧人(Klings,即印度人)及其他民族講得「荒腔走板」,但它仍不算是粗俗的語調(*vulgar tone*)。詳見Lim Hiong Seng, *A Manual of the Malay Colloquial such as spoken by all Nationaliti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Designed for Domestic and Business Purposes* (Singapore: Koh Yew Hean Press, 1887)。

²⁶ Lim Hiong Seng, 同上, p. i.;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14-315.

²⁷ 參見Rev. D.D. Chelliah, *A short history of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1800-1925*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47), pp. 27, 54-55.

²⁸ 峇峇馬來語作為「共通語」的事實,在該時期留下的歷史文獻中,曾被廣泛記錄下來,較有代表性的可參考: Reith, G.M., *1907 Handbook to Singapore* (1892/1907), revised by Walter Makepeace (Singapore: Fraser and Neave: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1986); Chia Cheng Sit, "The Language of the Baba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3(9), 1899, pp. 11-15;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p. 49-63; J.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Singapore, 1921, p. 77.; Tan Chee Beng, "Baba Malay Dialect", *Journal of the Malayan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3 (part1, 237), Malaysia, 1980, pp. 150-166.

但仍難登峇峇家庭之堂，回到家庭，一般峇峇仍必須以峇峇馬來語和妻子兒女及其他家族成員交談²⁹。可以說，直到 20 世紀初，峇峇馬來語仍是峇峇人（尤其女性及兒童）的第一語言³⁰。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日本佔領馬來亞（1942）以前，可視為是峇峇馬來語和英語的互補時期，峇峇馬來語的母語地位雖被撼動，但英語仍只是峇峇人的第二語言。

承接上文論述，個人認為，1890 年代峇峇女學的提倡，對峇峇馬來語的繼存而言，是一個轉捩點，因這意味著峇峇社會將全面暴露在英語的威脅下。1899 年新加坡華人女校的成立，可說是林文慶（Lim Boon King）及宋旺相（音譯，一譯作宋鴻祥，Song Ong Siang）等人提倡的「海峽華人改革運動」（Straits Chinese Reform Movement）的一環，主要是為打破女生只需在家閉門學習作一個賢妻良母的傳統觀念³¹。該校最初的課程設計，根據宋旺相 1897 年的敘述，語言教學包括了羅馬化馬來文、華文及英文；然而不久後卻漸漸轉向全面的英語教學³²。

事實上直到 19 世紀末期，大部分的峇峇女性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文盲，即便是識字，頂多也只到能用簡單的峇峇馬來文與族內女性通信，或閱讀遠行丈夫的峇峇馬來文信件的程度³³。女性不被允許拋頭露面的去上學，因父母擔心閨女們會因此「基督化」、「西化」甚至學會寫情書。無疑的，這次女子學校的成立，就是做為當地華人婦女解放運動的火車頭，此後許多教會女子學校便相繼出現，甚至也有請家教在教導峇峇馬來文之餘，也附帶教導英語的³⁴。可以說，在林文慶及宋旺相等人積極推動華人女子教育下，娘惹們多為文盲的情況到了 1920 年代以前已有所改善，例如，娘惹李珠娘便曾在 1913 年的一篇文章裡，肯定了華人女子教育的改進：

這三四年來可以察覺到一個平穩的改變，女孩不再被禁錮於家中，並被賦予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教育已被認為是必須的……現在，只要父母經濟能力允許，女生可享有和男生一

²⁹ 在二戰以前，峇峇家庭祖孫三代甚至四代同堂是普遍的現象，也因此許多傳統的峇峇文化包括語言，都得以代代相傳。

³⁰ 參見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in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56.

³¹ 由於受漢人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影響，早期能外出上學的通常只限於男生，女兒則留在家裡由女性長輩們教導女紅、烹飪或傳統禮儀等，只為將來成為稱職的賢妻良母。

³² 參見 Song Ong Siang,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1), 1897, p. 2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1984)), p. 305. 必須明確界定的是，華（語）文（mandarin）指的是應合當時中國教育推行的北平（官）話，有別於早期南洋華教中的「漢字方音」教育。

³³ 根據 Baba Felix Chia 的說法：「一般父母不讓女子上學，因認為婦女的位置在家裡，但他們同時也認為，娘惹們至少應學會書寫和閱讀他們唯一知道的語言（筆者按：峇峇馬來語）以便將來無須透過中間人，便能讀懂到外地出差的丈夫來信。」（筆者譯文；詳見 Felix Chia,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pp. 72-73.) 換句話說，（羅馬化）「峇峇馬來文」的讀寫能力便是年輕娘惹將來作為「賢內助」的必備條件之一。

³⁴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 (1), p. 105.

樣的受教權。(筆者譯文)³⁵

當然，娘惹們終於突破了峇峇馬來語的「禁錮」的同時，也正是「峇峇馬來語」走下坡的開始。

三、峇峇馬來語的沒落與斷層（1942 以後）

回顧峇峇馬來語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發展，確實，站在兩性平等及有教無類的觀點上，我們無法批判女性受教權的確立（或更應高興歡呼），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女性（英語）教育的發展的確為「峇峇馬來語」的命運帶來不小的變革。

然而，回歸峇峇所處的時空背景，其實最大的變革還是發生在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峇峇馬來語的衰敗，其原因絕不是片面的，從整體來看，主要包括以下數點：

（一）教育政策的改變：

英國統治時期，英語學校的成立，對峇峇社會的語言及文化認同產生很大的影響。1899 年開始，峇峇知識份子及一些英國學者曾為「峇峇人在學校該學甚麼語言？」而掀起一場論辯，根據德國學者 Jürgen Rudolph 的分類，主要分為「(標準)馬來語派」、「英語派」、「華語派」、「三語派(英、中、羅馬化馬來文)」及「峇峇馬來語派」，最後，由於客觀有利條件的輔助，「英語派」在 20 世紀初期取得了壓倒性勝利。³⁶此後英語學校的發展(詳見第一章第二節)更顯蓬勃，加上英語在殖民時期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徵，許多峇峇都把子女送入英校，久而久之，英語成了受過教育的峇峇人的主要語言之一。回溯到 1920-30 年代，在社會的交流上，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也開始慢慢取代峇峇馬來語成為共通語。此外，1890 年代開始出現的「峇峇馬來文」，書寫時的拼音與文法經常是憑書寫者隨性拼湊，始終有規範化成為一套「標準文字」。對峇峇人而言，峇峇馬來語的口語功能實質上更大於書面語，尤其許多受英語教育的峇峇人，更喜歡以英文為書寫語體，因此，峇峇馬來語要透過文字傳承的難度也相對提高。

然而，正如前文所說，英文作為峇峇（尤其男性）的社交語言，在 20 世紀以前並不足以動搖峇峇馬來語的「母語」地位，只有當這些受過英文教育的父母，為了孩子在學校的表現等理由，改以英語和孩子溝通，甚至

³⁵ 原文(英文)見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1984)), p. 500. 李珠娘(音譯, Lee Choo Neo), 為新加坡第一位華人女醫生, 亦為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之姑母, 其生平可參見其自傳性文章: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girl in Singapore", in *Queen*, London, 1913: repr. as "60 years ago it was cloistered existence" in *the New Nation*, 17 Jan. 1972.

³⁶ 詳見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20-327.

在孩子入學前，也從不教導峇峇馬來文，峇峇馬來語因此在許多峇峇家庭當中，才逐漸被取代，這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嚴重³⁷。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分別於 1957 年及 1965 年獨立，兩國政府也開始推行各自的國民教育。在馬來西亞，獨立後憲法規定（標準）馬來文為國語，並積極推動馬來文正規教育³⁸，當地華人不滿政府實施民族保護主義政策而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為了保存中華文化及華人認同，華人堅持捍衛華文教育；戰後基於政治的因素而不得不向非峇峇華人靠攏的峇峇們，也開始把孩子從進華文學校，除了因為認同，近幾年隨著華語的「經濟價值」提高，學習華語的峇峇孩童也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學校的國民教育也讓年輕一輩的峇峇們習得了「標準馬來語」(Bahasa Malaysia)，峇峇馬來語在部分人眼中開始變得「不標準」及不入流了。

在新加坡，華人雖為主體民族，但考慮到周遭強勢的馬來文化，為免新加坡在馬來群島中成為第三個中國，開國初期新加坡政府認定官方語言為馬來語、英語、華語及淡米爾語四種，馬來語雖貴為國語，卻有名無實，以教育為例，政府一直則重英語（較中性）的政策；儘管有少部分具文化傳承使命感的峇峇父母把孩子送到馬來學校受教育³⁹，但整體而言，年輕一輩的峇峇幾乎都在英語環境中成長。近年來，有鑑於政府過度西化及年輕一代中華論理觀念的喪失，政府開始大力推行「講華語運動」⁴⁰，甚至從 1981 年開始推行母語教學政策，官方認定「華語」為峇峇人的「母語」⁴¹，雖然這政策引起大部分峇峇不滿，卻也莫可奈何，總之這樣的教育政策對峇峇馬來語的毀滅性不可謂不小。

（二）居住環境的改變及峇峇社會網狀系統（social network）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嚴重打擊了峇峇的經濟，許多峇峇家庭因戰爭而家財散盡，被迫遷移到鄉下（一般鄉下馬來居民較多）或其他非峇峇馬來語區。此外，現代化及城市化的發展，也侵蝕了峇峇原來的聚居地，以新加坡的如切(Joo Chiat)、加東(Katong)、翡翠山(Emerald Hill)及芽籠(Geylang)區，或馬六甲的荷蘭街(Heeren Street，現改稱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等為例，儘管部分舊樓房仍在，也仍有少部分的峇峇繼續居住，但更多已搬離到新的住宅區。以筆者走訪翡翠山及荷蘭街的經驗，許多樓房已人去樓空，因靠近市區，部分也因其「建築特色」而被承租作商業用途，根據

³⁷ 詳見Jürgen Rudolph, 同上, pp. 338-339。

³⁸ 馬來西亞獨立前十年，英語及馬來語並列官方語言。1967 年後，則獨尊馬來語。

³⁹ 其實孩子在馬來學校學的是「標準的」馬來語，但年長一輩總抱有聊勝於無的心態，峇峇馬來語或「標準馬來語」，終歸是「馬來語」，在語言認同上，這總比那陌生的「華語」來得親近些！

⁴⁰ 筆者記得當初運動的口號是「多講華語，少說方言！」，在鼓勵大家多講華語的同時，實質也是在「打壓」其他漢系語言（「方言」）的生存空間。

⁴¹ 詳見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43-358；陳志明，〈華裔族群：語言、國籍與認同〉，載於《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會科學版），Vol. 21, No. 4, 1999, 頁 29。

當地的峇峇娘惹告訴筆者，許多年輕一輩的峇峇都已不住這裡，空曠深邃的樓房已成了峇峇們逢年過節才會回來祭拜祖先的“Rumah Abu”（祖屋）。由於居住環境的改變，及峇峇社會網狀系統的瓦解，峇峇必須重新適應新的語言環境，人口上的「落單」，使他們在對外交流時被迫學習用其他強勢語言，久而久之則出現轉語現象，甚至本身的峇峇馬來語也逐漸受周遭語言侵蝕，失去個性。此外，聚居區域的解體，也導致從前峇峇社區中諸如敦親睦鄰、詩歌或說書聚會、在五腳基閒聊等經常性活動的消失。筆者在馬六甲出訪時，一位鄧老先生回憶說：

我小時候常到荷蘭街後面的海灘抓螃蟹，每天黃昏時娘惹們都會坐在屋後嚼檳榔，聚在一起閒話家常……是囉！都講馬來話。⁴²

語言的生命力往往是在街坊鄰里熱絡的交流中最為活躍，可惜的是，像這類日常活動，現在已非常少見，穿梭在苟存的峇峇社區中，有的只是大門深鎖，門庭冷落，而峇峇馬來語的生命力，也隨之黯淡下來。

除此之外，從“Rumah Abu”祖先崇拜的信仰看，其實峇峇的家族以及宗族的觀念是非常強的，並且在峇峇的民族精神中，也經常強調「孝道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峇峇家庭中三代同堂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這樣的居住型態提供了峇峇家族隔代溝通的機會，也非常有利於峇峇馬來語的傳承，尤其是峇峇家庭中女性當家的習慣，以早期娘惹們的單語現象看⁴³，即便年輕的雙語父母改以英語和孩子溝通，孩子們在家庭（族）中的峇峇馬來語成長環境仍是沒問題的。只是，這種祖孫同堂、家族聚居的居住形式在戰後已逐漸瓦解，在年輕夫婦組成的單一家庭當中，峇峇馬來語在孩子的成長中經常派不上用場，直到 1970 年代峇峇馬來語在傳承上，已出現「上言不正，下言歪」的情況；一般戰後出生的孩子，已無法流利的用峇峇馬來語和長輩溝通，甚至有完全不諳峇峇馬來語者，峇峇馬來語的傳承出現了嚴重的「斷層現象」。

（三）族外婚：

二十世紀初期以前，峇峇社會中族內婚及入贅婚非常盛行。雖然峇峇男性除了娶娘惹之外，也可以選擇與外族女子通婚，然而在峇峇女性方面，一般父母都不願女兒嫁給非華人，因此，娘惹們大部分都嫁給峇峇，形成了族內婚現象，既然都嫁給「自己人」，語言（人口）外流的現象也就偏低了。此外，19 世紀中期以後，大批下南洋中國男子，由於華人女性奇缺，而娘惹們相較下家世背景也不錯，許多新客單身漢紛紛進贅到峇峇家庭，從此過峇峇生活，兒女雖仍從父姓，實質上已被併入峇峇社會，峇峇馬來

⁴² 2003 年 2 月 13 日馬六甲田野記錄，訪談地點：馬六甲雞場街（Jonker Street）。鄧老先生，64 歲，海南人，從祖輩到子孫，已在海南街住了五代。海南街為貫穿荷蘭街與雞場街的一條巷道。

⁴³ 即便到 1900 年以後，許多娘惹已能操雙語，然而在 1950 年代以前，她們的家庭用語（第一語言）普遍上仍是峇峇馬來語。

語的使用人口也相應增加。

然而，這類「婚制」在戰後迅速被「族外婚」所取代，尤其娘惹們開始嫁（出）到非峇峇華人家庭，婚後被納入非峇峇華人社會裡。即使是峇峇娶入非峇峇華族女子，在「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中，孩子們成長過程中的母語環境，也經常是由操強勢漢語的母親所主導。

（四）現代傳媒的出現：

資訊時代的降臨，尤其電子媒體（電視等）的蓬勃發展，峇峇生活閒餘的娛樂空間，幾乎被這些摩登娛樂設施所佔據，早期峇峇社會熱絡的文娛活動，如馬來戲劇、馬來民謠等在現代已乏人問津。90 年代中期以前，就語言的流通性而言，新加坡的電子媒體著重英語及華語（禁止其他漢系「方言」播送），馬來語節目只排在冷門時段，峇峇馬來語節目更是稀有。而馬來西亞電子傳媒則馬來語及英語並重，有大約三分之一時間播送華語節目（附加小部分福建話與廣東話節目），平面媒體則馬來語、英語、華語及淡米爾語皆有，絕大多數人則根本不知道有所謂的峇峇馬來文存在。可以說，在峇峇馬來文刊物於 1950 年代銷聲匿跡之後，新馬兩地峇峇馬來文在傳播媒體的生存空間，幾乎被其他強勢語言逼到絕境。

（五）漢化：

20 世紀初期，峇峇的經濟基礎有從商業逐漸轉移到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會計等）領域的趨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創，峇峇可說已失去了他們長久以來在新馬商場上的主導性地位。戰後，人口眾多的非峇峇華人，在政治及經濟上的「籌碼」都比峇峇來得強大。以前是峇峇人鄙視「新客」窮酸，現在非峇峇華人（主體華人）則以峇峇人講「番仔話」及馬來化的生活習慣而歧視他們。許多峇峇羞於在外頭講峇峇馬來語，為免被取笑及歧視，最後都把「峇峇馬來語」收藏在家裡，語言環境被壓縮，峇峇馬來語已不再是各族互通有無的「交際語」。

漢語成了強勢語言之一，民族主義的興起也使華語成了華族認同的標誌，面對「祖國」（英國）的遺棄、馬來人的威脅，在泛華族主義者的「號召」下，一些峇峇父母乾脆把下一代送去接受華文教育，以便「認祖歸宗」。儘管在 20 世紀結束以前，受華文教育的峇峇娘惹相較於受英文教育者，仍只是少數。然而，在當代政府及民間母語（等於華語）教育的配合下，加上近幾年華語不斷提升的經濟效益，漢化對峇峇文化及語言繼存的威脅，已不可等閒視之。

縱而言之，20 世紀 40 年代以後，日本佔領時期的仇華與皇民化政策，乃至戰後民族主義、政治局勢的風起雲湧，都使峇峇社會嚴重受挫，連帶的也影響了峇峇馬來語在此之前旺盛的生命力。直到 1970 年，據陳志明估計，在馬六甲地

區講峇峇馬來語的華人只剩下 5,000 人左右；而新加坡地區，根據 Anne Pakir 1986 年的報告，能講流利及半流利峇峇馬來語的人口加起來也只有 5,000 人。⁴⁴

四、峇峇馬來語的復甦？(1980 以後)

從當代峇峇人的隱性及語言的沒落，一些人已開始宣判峇峇馬來語的「死亡」，有些則仍存一線希望，認為它只是「瀕臨絕種」，也有更樂觀者，認為只要一息尚存，峇峇人仍需要它，峇峇馬來語都有權被尊重並繼續生存下去，「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莫過於我們從未能真正預知未來……」（筆者譯文），承接陳志明這句話⁴⁵，我們或許可以來探討峇峇馬來語「敗部復活」的可能性，因這將關係到峇峇文（學）繼存的問題。

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峇峇獨特的文化逐漸受到學者專家及媒體的注意，許多相關的報導及專題研究在這數十年中紛紛出爐（關於峇峇研究概況，請見緒論中的介紹，這裡就不贅述）。1980 年代開始，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曾經在公共場合上銷聲匿跡的峇峇馬來語，也開始出現復甦跡象。年輕一代的峇峇，開始對峇峇馬來語產生興趣，除了和父輩或祖輩們對話，同輩間也嘗試以峇峇馬來語對談。而在這股「復興運動」中，新加坡的土生華人公會（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和愛之山協會（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扮演了積極的推動角色，以愛之山協會為例，從 80 年代至今連續推出了多部峇峇（馬來語）舞台劇（Wayang Baba，英文稱為 Peranakan Plays，詳見第三章），社團內也經常舉辦 Dondang Sayang 詩歌吟頌活動。此外，一些峇峇教徒眾多的教會，以峇峇馬來語進行宗教活動的情形也增加了，除了甘榜嘎保衛理公會（Kampong Kapur Methodist Church）等仍以峇峇馬來語唱聖歌及講道，有些教會也還保留峇峇馬來文書寫外，例如加東（Katong）的聖家堂（The Holy Family Church），也跟進以峇峇馬來語進行農曆新年的天主教彌撒⁴⁶。

在書寫方面，有 Felix Chia 等人重拾峇峇馬來文，寫出如《老夫少妻》、《選媳婦》等劇本，並在以英文撰寫介紹峇峇文化的書中，對峇峇馬來語有非常生活化的介紹⁴⁷。而 1993 年由峇峇魏天福（William Gwee Thian Hock）撰寫的《足金：峇峇話精粹》（*Mas Sepulu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一書的面世，則可說是新馬峇峇世界的一個創舉，無疑的，在峇峇馬來語研究及學習上，它將是一本不

⁴⁴ 由於自有戶口統計以來，峇峇人一直被歸類為華人，在民族歸屬上並沒有另外分類，因此要從官方數字中查出峇峇人的確切人口數，事實上相當困難。

⁴⁵ 這是陳志明教授 1990 年於峇峇會議上發表：“The Baba and the Malay Language”的講詞，轉引自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u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 xxxv.

⁴⁶ 參見 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p. 52-53;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3), p. 52.

⁴⁷ 這些書其中包括有：Felix Chia,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等。

可或缺的工具書。

觀察這股語言復興潮，Anne Pakir認為，峇峇對語言的認同和積極態度是可見的，然而，這並不能保證語言的生存。和 50 年前相比，峇峇馬來語的使用人口已經大量銳減，此外，現實客觀因素諸如城市化、現代化、族外婚、宗教信仰的改變等，都在不斷的侵蝕著峇峇的社會與語言⁴⁸。1940 年代以後，語言的「轉語現象」(從峇峇馬來語轉到英語)在峇峇社會當中相當普遍，直到 20 世紀末期，許多峇峇家庭已經淪為「單語家庭」，目前除了少數能同時操漢語外，英語已成了生活上唯一的溝通語。換句話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來，年經一輩峇峇對語言的認同與積極態度，是屬於根基性的情感連繫 (primordial attachment)，語言，無庸質疑，是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指標，然而，語言的認同與使用往往也具有「工具性」的依附作用，以現在年輕一代一些能講峇峇馬來語，卻不能流利溝通的情況看來，峇峇馬來語的生命空間已被擠壓得搖搖欲墜！當然，我們可以樂觀的說，有這樣的復甦總是好的，未來如何無法預料，也因此，峇峇馬來語的斷層現象如何能和 50 年前的「原音原味」接軌？又如何避免語言趨利性作祟？等問題，正是我們現在應該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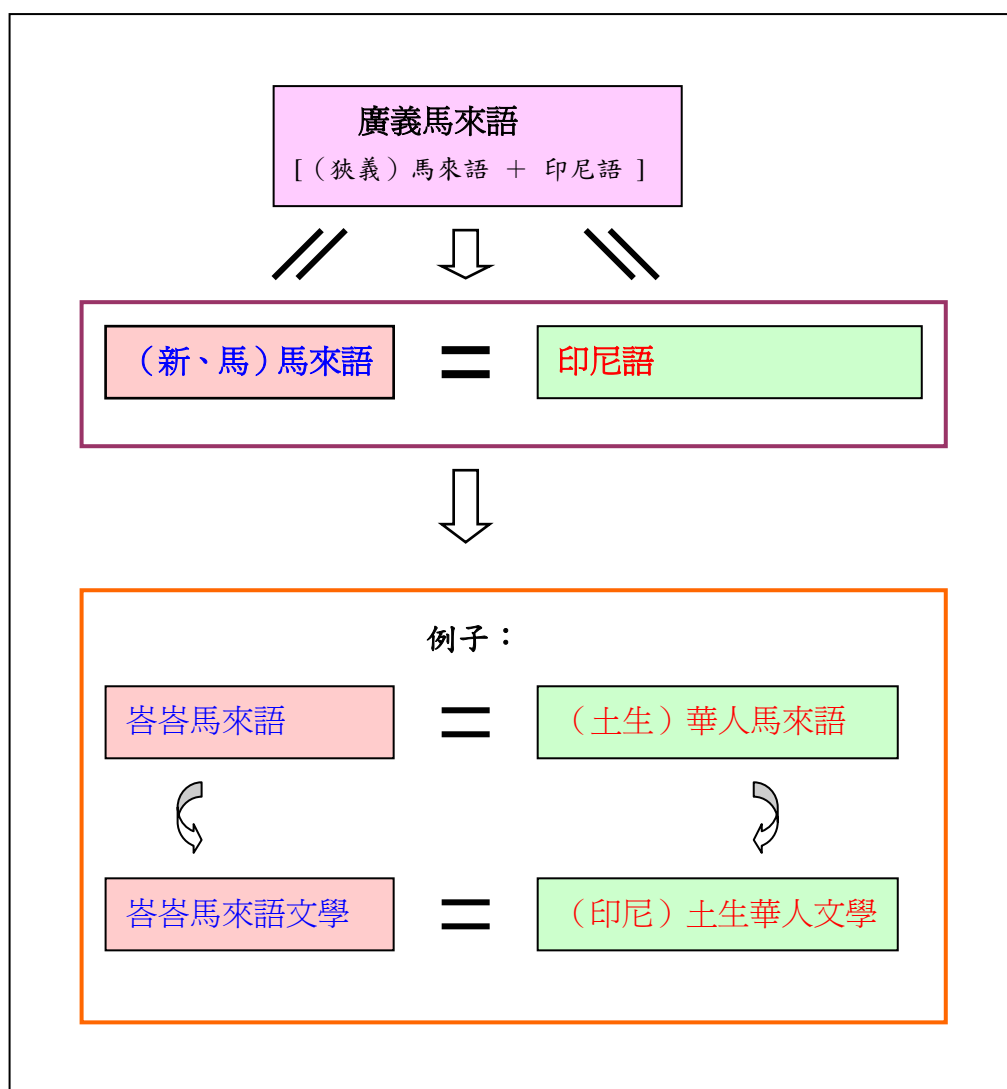
五、峇峇馬來語 與 (印尼) 土生華人馬來語之比較

談及新、馬兩地的「土生華人」，尤其具有母系馬來血統者，一般難免的也會附帶提到印尼的土生華人，況且從整個歷史背景及文化相似度看，我們實在無法把新馬峇峇與印尼土生華人之間的聯繫一刀切斷⁴⁹。可是也因為這樣，許多學者常常喜歡把兩者混為一談，而模糊了其間因時空及客觀發展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這種情況尤其經常發生在「馬來語」的論述上。以「華語」學界為例，長期以來籠統 (或說廣義式) 的「馬來語研究」，造成了許多不明就理者的「泛馬來語」認知，誤將現代的印尼語等同於新馬地區所使用的「馬來語」，而無察於兩者其實「形似而神異」，甚至以偏概全，以這套「廣義馬來語模式」(見表 1-1) 套用到印尼及新馬相關的馬來議題上。

⁴⁸ 詳見 Anne Pakir,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Peranakans", in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r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p. xii-xiii.

⁴⁹ 例如以筆者的 1970 年代出生的蘇姓學弟為例，他是馬六甲峇峇，從小卻由來自印尼的土生(華人)奶媽帶大。

表 1-1：廣義馬來語模式



關於(新馬)馬來語和印尼語之間的區別，以及兩地土生華人的語言對前兩者的影響性問題，筆者將留待第五章進一步探討，這裡筆者將注重於兩地「土生華人」馬來語的比較。有鑑於峇峇馬來語常因其混合各種語言元素而被認為是「混雜」的「低級馬來語」，因此，這裡我們先來聊解一下馬來語所謂「高級」、「低級」以及兩者的使用情形，進而再釐清新馬「峇峇馬來語」和印尼「華人馬來語」之間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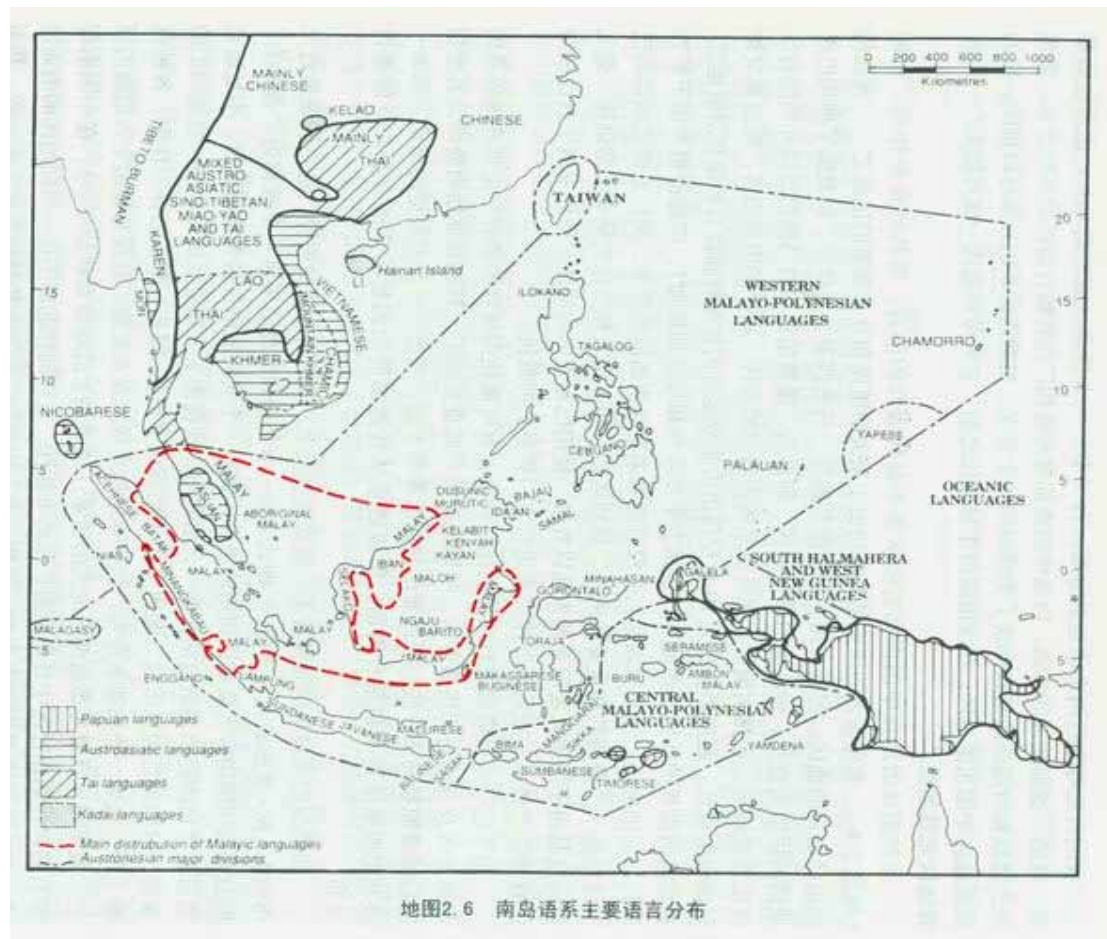
首先，從表 1-2 我們可清楚看出，所謂「低級馬來語」其實只是相對「高級馬來語」而言，而標準則在於其通俗性和在語音詞匯上的相對「不純」。根據 1913 年 Shellabear 的研究，18 世紀初期，「高級馬來語」使用區主要集中在馬六甲海峽兩岸，西起蘇門達臘島東岸，東至馬來半島，北起泰國南部，南到新加坡以南的廖內群島⁵⁰。見圖 1-II，若從國界上劃分，它是佔新、馬兩地主要的語言，擁有

⁵⁰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p. 49-63.

龐大的馬來語使用人口，既是馬來人的日常用語，也是用來書寫文本的書面語。然而在印尼，馬來人只是少數民族，且聚居於靠近馬來半島的廖內群島及蘇門達臘島，在廣大的印尼群島中，「標準馬來語」不僅是弱勢語言，還是大多數人認為的「死亡語言」。弔詭的是，這語言卻在印尼獨立後，被「異地異族」（爪哇島，爪哇人等）借用，發展成為能活用的「印尼語」。

另一方面，「低級馬來語」主要通行於馬來群島各大貿易港口及商業城市。由於使用人口兼及各族，其語言變化性非常高，「混合語」的模式常會因地域及參與民族的不同而改變，例如在印尼華人社區變成「華人馬來語」，而在早期新馬的峇峇華人社區則演化成「峇峇馬來語」，兩者之間的差異，從表 1-2 便一覽無遺。

圖 1-II：「標準馬來語」使用地區（---虛線範圍）



資料來源：尼古拉斯·塔林主編，《劍橋東南亞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 90。紅虛線範圍經筆者加工。

表 1-2：高級馬來語與低級馬來語的比較⁵¹

語言 比較項目	高級馬來語 (High Malay)	低級馬來語 (Low Malay)
其他稱謂	標準馬來語 (Standard Malay)、純馬來語 (Pure Malay)	通俗馬來語 (Colloquial Malay)、巴利 (市場) 馬來語 (Bazaar Malay)
定義	→馬來語書面語，例如在馬六甲與亞齊勢力興盛時期 (15 世紀~17 世紀)，是書寫及學習馬來古典文學的語言。並且是馬六甲海峽沿岸地區馬來人的口語。 →因絕大部分的馬來人都定居鄉下，所以又被認為是「鄉下話」。	→歐洲人、華人、印度人、馬來人、混血兒、爪哇人及其他在這地區經商的民族之間的交際語。 →因通行於海峽殖民地、各大城市及商場，所以被認為是商業語言。 →「馬來混合語」
使用情況	1. 英屬「馬來亞」：馬來半島、新加坡。 →馬來人 (主體民族) →非常活躍，是日常會話的口語，也是書寫馬來文學的書面語。 2. 荷屬東印度公司：蘇門達臘東岸、廖內群島 →馬來人 (少數民族) →一般只限於官方、學校及正式場合。絕大多數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地區的居民不諳標準馬來語。少部分有學過者都只把他當成書寫馬來文學的書面語，並認為這是「已死的語言」。	1. 英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各大城市及商場上各民族之間的交際語。 2. 荷屬東印度公司：爪哇島 →爪哇人、巽他人及其他各民族之間的交際語。(低級馬來語並不是爪哇島原住民的民族語言，它基本上是 18 世紀時，荷蘭人從印度尼西亞東部各島嶼引入的奴隸所帶來的「外來語」。)
外來語的影響	極少	多
客觀因素導致的變化	變化極小、穩定	變化極大 變體 (例子): 1. 英屬「馬來亞」：峇峇馬來語 2. 荷蘭東印度公司：(土生) 華人馬來語

⁵¹ 本表製作的主要參考資料為：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p. 49-63. 許友年，〈試論華人馬來語的歷史作用〉收入《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頁 91-108。

表 1-3：峇峇馬來語與（印尼）華人馬來語的比較

語言 比較項目	峇峇馬來語 (Bahasa Melayu Baba)	華人馬來語 (Bahasa Melayu Tionghua)																												
原型	通俗馬來語 (馬六甲馬來語)	通俗馬來語 (巴達維馬來語)																												
主要使用地區	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	爪哇島																												
次要吸收元素（主體馬來語及 Holo 語之外）	1. 爪哇語、巽他語等印尼群島民族語言（吸收成分比（土生）華人馬來語少，但比「標準馬來語」多） 2. 英語	1. 爪哇語、巽他語等印尼群島民族語言（受影響程度比峇峇馬來語多） 2. 荷蘭語																												
羅馬字母拼音法	英語模式 例子： ⁵² <table border="1" style="margin-left: 20px;"> <thead> <tr> <th>拼音</th> <th>例子</th> </tr> </thead> <tbody> <tr> <td>ch</td> <td>Chrita</td> </tr> <tr> <td>j</td> <td>Jalan</td> </tr> <tr> <td>ny</td> <td>Nya</td> </tr> <tr> <td>u</td> <td>Pun</td> </tr> <tr> <td>y</td> <td>Yang</td> </tr> <tr> <td>kh</td> <td>Akhir</td> </tr> </tbody> </table>	拼音	例子	ch	Chrita	j	Jalan	ny	Nya	u	Pun	y	Yang	kh	Akhir	荷蘭語模式 <table border="1" style="margin-left: 20px;"> <thead> <tr> <th>拼音</th> <th>例子</th> </tr> </thead> <tbody> <tr> <td>tj</td> <td>Tjrita</td> </tr> <tr> <td>dj</td> <td>Djalan</td> </tr> <tr> <td>nj</td> <td>Nja</td> </tr> <tr> <td>oe</td> <td>Poen</td> </tr> <tr> <td>j</td> <td>jang</td> </tr> <tr> <td>ch</td> <td>Achir</td> </tr> </tbody> </table>	拼音	例子	tj	Tjrita	dj	Djalan	nj	Nja	oe	Poen	j	jang	ch	Achir
拼音	例子																													
ch	Chrita																													
j	Jalan																													
ny	Nya																													
u	Pun																													
y	Yang																													
kh	Akhir																													
拼音	例子																													
tj	Tjrita																													
dj	Djalan																													
nj	Nja																													
oe	Poen																													
j	jang																													
ch	Achir																													
基本模式	[通俗馬來語 + Holo 語] + (爪哇語、巽他語等) + 英語 + 其他	[通俗馬來語 + Holo 語] + (爪哇語、巽他語等) + 荷蘭語 + 其他																												

第二節 （峇峇）福建話

德國學者 Jürgen Rudolph 曾以宋佛儉 (Song Hoot Kiam, 1830-1900)、陳若錦 (Tan Jiak Kim, 1858-1917)、陳文進 (Tan Boon Chin, 1857-1933) 及曾錦文 (Chan Kim Boon) 等 “Chinese-speaking Babas” 為例證，認為：

It is incorrect to say that the Babas...could not speak ‘Chinese’. In fact, many could speak Hokkien and other so-called ‘dialects’. However, unlike other those born in China, many of the Babas were fluent in English and Baba Malay.⁵³

⁵² 參考資料：魯白野編，《實用馬華英大辭典》（星洲：星洲世界書局，1959）；劉居然、王復泰，《馬來亞語·漢語辭典》（台北：名山出版社，1987）；郭壽華，《新·馬通鑑》（臺北：郭壽華出版，1967）。

⁵³ 詳見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313-314; 文引自 p.313。關於峇峇的「漢語經驗」，另可參見 Lim Boon

(譯文：說峇峇不會說漢語 (Chinese)，是不確切的。事實上，他們之中很多人會講福建話和其他所謂的「方言」。不過，和那些在中國出生的華人不同，很多峇峇同時能講流利的英語和峇峇馬來語。)

Jürgen Rudolph 的認知挑明了一點，即在能流利的掌握英語及峇峇馬來語的同時，峇峇並沒有全面「背祖『語』忘宗『言』」。當然，這裡 Jürgen Rudolph 所指的“speak ‘Chinese’”，若從漢系諸語的角度檢視，概念上似乎過於籠統，讓人無法從英文“Chinese-speaking”一詞找到明確的指涉對象，是講華語？福建話？還是潮州話、客家話？以致讓人對峇峇“could (not) speak ‘Chinese’”一事仍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印象。

再來我們看看張木欽在《荷蘭街口夕陽斜》中的敘述：

甲、檳、新三地峇峇，以馬六甲的為最悠久，儼然是峇峇正宗。……之中，又以福建峇峇為『上品』，潮州峇峇被認為品級較低……⁵⁴

這段話明確的告訴了讀者，峇峇社會內部的族源分野與階級性。不僅福建及潮州峇峇，其實峇峇社會還有像李光耀家族這類的客家峇峇，可見，峇峇的漢系語源事實上不僅Holo話一種。只是，由於福建峇峇無論在歷史深度、語言的影響、人口數和「品級」上，都超前於其他漢系峇峇許多，因此，在談及峇峇文化時，幾乎都以「福建峇峇」為代表，而其他漢系民族的文化 and 語言在峇峇文化中的表徵，其實也是非常隱性的。另外，根據許友年的研究，在他統計過的八部印度尼西語和馬來語詞典中所收入標明為漢語借詞共 511 個，其中Holo語借詞就有大約 456 個，佔有率高達 89.2%，⁵⁵由此證明，在東南亞華巫民族的交流使上，Holo話的影響相對其他漢系語言，其重要性是非常顯著的。因此，這一節在講到峇峇人的「漢系語言」經驗時，筆者將只著重於「(峇峇)福建話」。⁵⁶

正如前文有說，在新、馬兩地，官方都認定華人的「母語」或民族語言是華語，這種本質上的「誤認」，往往造成一般人的「誤解」。事實上，華語雖為華人的標準語言，但在華人之間，華語只在少數人的交談或某些正式場合中才派得上用場。雖然講華語的機率隨著年輕一代的逐漸「華語化」而有增加的趨勢，但一般華人生活中的主要語言，還是各自的「家鄉話」，即廣府話、福建話、潮州話等漢系語言⁵⁷。除了不會講任何漢系語言的華人外(例如只會講英語的峇峇)，「方

Keng, “The so-called clash of races in Malaya” in *Straits Chinese Annual*, pp. 1-11, 以及 Ruth Ho,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75), p. 42.

⁵⁴ 張木欽，《荷蘭街口夕陽斜——峇峇文化：一次文化統合的奇異經驗》(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頁 27。

⁵⁵ 參見許友年，〈閩南方言對印尼語和馬來語的影響〉，載於《福建師大學報》，1981 第二期（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112-116。

⁵⁶ 華語，在東南亞尤其新、馬地區，其概念有別於「漢語」。其詞義相當於現代中國人所說的「普通話」，或兩岸三地所謂的「國語」。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雖各有方言群認同，在多元民族的社會中，卻也同時擁有「華族共同的語言」是「華語」的想法。他們並不習慣於「普通話」或「現代漢語」的概念，當然也不可能用「國語」一詞。漢語，則指廣義包含華語、及其他「方言」在內的漢族語言。

⁵⁷ 這些所謂的「家鄉話」，在新馬一帶被泛稱為「方言」，這種分法固然有受到源自早期中國官方的非語言學非民族學概念（北平官話以外的漢系語言皆為方言）的分類法所影響，但若從「家

言」，其實才是新馬華人真正的母語。因此，在談及同樣具有「華人」認同的峇峇時，除了峇峇馬來語及英語，接下來在峇峇社會歷史及現實生活中較有碰觸的，則當屬峇峇大宗福建峇峇的祖源語——「福建話」。

從梁紹文的遊記（見第一章前言）中我們知道，1920年代，馬六甲的峇峇中其實有少部分會講「福建話」。2002年3月當筆者到訪馬六甲峇峇公會（*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時，受訪的峇峇對內講峇峇馬來語，對外也能交替以英語、「福建話」受訪⁵⁸。只是，新馬地區華人講的所謂「福建話」，其實已經是一種受當地文化所涵化的語言，其中「檳城福建話」便是一個例子。回歸峇峇的語言經驗，若要作全面性的瞭解，就不得不提檳城峇峇和他們的主要語言「峇峇福建話」。而談及峇峇福建話，則必定會與「檳城福建話」有所牽扯，因這可說是目前峇峇社會中僅存的「福建話活化石」。因此，本節的討論範疇將分為兩個層次：（一）福建話、（二）峇峇福建話。

一、福建話

既然語言已經被馬來語涵化，以峇峇馬來語為母語，峇峇究竟是怎麼懂得福建話的？又福建話在以峇峇馬來語及英語為重的峇峇人當中，又是如何做到一息尚存？要解答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從早期華人的「方言」教育談起。

私塾教育則是新馬華教在啓蒙時期唯一的教育形式。早期的華教都是承自中國南方的「方言」教育，即以私塾學堂的形態以「漢字方音」傳授中國文化知識，無論是自設、自請或公開的私塾，塾師一般都根據自己的「方言」教導族群內子弟，因而有所謂的粵語私塾、閩語私塾、潮語私塾及客語私塾等。⁵⁹而教授的課程主要包括《幼學瓊林》、《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以及一些簡單的尺牘、珠算等教導修身、謀生的科目。根據鄭良樹的研究，我們有理由相信，早在十八

鄉話」的角度切入，這些「方言」來到南洋，在早期華人移民社會當中，其實已經附帶了一層「來自何『方』？」的意涵，筆者認為，這裡的「方言」概念已有所轉向，迄今，新、馬地區華人所說的「方言」，其意義更偏重於民族團體的認同（或被稱為「方言群認同」，其概念可參見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以及東南亞華人「祖籍地」的追溯。當某華人A問：「妳家裡講甚麼話？」或「你是甚麼人？」，而華人B答：「我家裡講福建話」、「我是福建人。」時，一般當地華人能會意的是：B講福建話，是福建人；但這僅止於B的父系祖先是來自福建（祖籍地概念）的想法，而不是B真的是中國的福建人，B仍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華人（民族範疇），是新馬華人內部的「福建人」（民族團體或「方言群」範疇）。換言之，在當地，「福建人」的認定界線僅在「華族」內部的各「民族團體」，而沒有擴大到「民族」（*ethnos*）甚或國族（*nationality*）的範疇。

⁵⁸ 2002/03/17日馬六甲田野記錄。另，*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有些學者也將之譯為「馬六甲伯拉奈幹華人公會」（1984）。

⁵⁹ 早期的私塾學堂，形式上主要分為三種：（一）教館、坐館：由富有人家「自請」塾師到家中，為自己及親子子弟授課；（二）家塾、私塾：塾師在家中「自設」講帳，在自家中開館授課；（三）義學、義塾：富裕者個人，或群體禮聘教師，在一個公開場所設塾，「公開」招收族中子弟或家境貧寒子弟，免費授課。關於私塾學堂形式的討論，詳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31-39；另見陳育崧，〈馬華教育近百年史緒論〉《椰陰館文存》卷二（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頁227。

世紀末期，馬來亞華社已經出現簡陋的私塾教育。最先極可能在馬六甲，檳城與新加坡接續跟進，而後再由「三州府」擴散到新馬其他內陸地區。此外，根據目前史料顯示，檳城及新加坡的「福建幫」是最早將宗親會及會館帶進華教活動中的民族團體，他們在自己的社群組織內開辦了富有辦學精神和目標的閩南語私塾，免費教導自己族團內的子弟，這事件間接刺激了其他「方言」族團，紛紛興辦學塾⁶⁰。而私塾教育的辦學情況，以新加坡為例，1887年曾到訪新加坡的李鐘珪在其著作《新加坡風土記》曾記錄道：

閩、廣士子在叻授徒者，頗不乏人。⁶¹

此外，《叻報》於1890年也有報導：

叻中書塾，自請儒師以及自設講帳者外，其餘如萃英書院、培蘭書室、毓蘭書室、養正書屋、樂英書室等，多至不可勝言。⁶²

可見在19世紀中期，私塾教育在新馬華人社會當中是頗為熱絡的。峇峇作為早期甲、檳、新三地華人社會的主體，加上在峇峇社會中人口眾多的「福建幫」，以及第一代、第二代峇峇對中華文化清晰的記憶等等因素，我們可以推測，峇峇無可避免的會與這股教育潮流有所瓜葛。事實上，經過史料的耙梳（見表1-4），我們發現到，峇峇不僅參與私塾教育的興辦，許多峇峇在成長過程中都上過私塾學堂，即便是受英語教育的峇峇，則往往會在其入學前，接受私塾「方言」啟蒙教育。

表 1-4：峇峇在私塾教育的參與實例⁶³

人物	概述
陳金聲 (1805-1864)	陳氏為早期新加坡閩幫領袖及富商，生意網絡含括新加坡及馬六甲。陳氏出生於馬六甲，幼年就讀私塾學堂，也進教會學校學習英文、荷文。能操福建話、峇峇馬來語及英語等。1849年創辦崇文閣（義學，新加坡）；1854年創辦萃英書院（義學，新加坡，以Holo語教學）
陳明水 (1828-1884)	出身馬六甲峇峇，能操英語及峇峇馬來語。筆者搜索資料中未提及福建話能力，但以其做為新加坡永春會館領袖的角色看，必定也能講福建話。1854年與陳金聲創辦萃英書院。
陳文進 (1857-1933)	出生馬六甲，幼年在馬六甲「華文」學堂就讀，十二歲赴新加坡就讀萊佛士書院。
李清輝 (183?-1896)	出生馬六甲，19世紀中期到新加坡。積極參與永春會館，資助萃英書院，並任考官，且曾以中文書寫〈東游紀略〉，刊於早期《叻報》，可見他應會講福建話，懂漢文，也受過私塾教育。
林義順 (1879-1936)	出生於新加坡，童年入家塾學習中文，十歲進聖約翰書院和英華學校讀英文。
曾錦文 (1851-1920)	出生於檳城，幼年就讀於檳城大英義學，家中亦請私塾老師教導「華文」，1866年被父親送往中國福州，進入馬尾水師學堂（即海軍學校）就讀。

⁶⁰ 根據史料記載，馬六甲確定在1815年已有私塾學堂的存在，新加坡在1829年肯定已有私塾學堂，而檳城最遲1830年已有私塾學堂。詳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1-44。

⁶¹ 李鐘珪，《新加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7（1887）），頁9。

⁶² 《叻報》，1890年3月13日報導。

⁶³ 本表係根據以下資料整理而成：柯木林，《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公司，1995）。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黃堯，〈華文與峇峇文學〉，《新·馬華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1967）。

可見早期的峇峇儘管以峇峇馬來語為母語，部分人卻不會真正與父系的「福建話」隔絕，這一方面是傳承自第一代的峇峇，但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源源不絕的福建移民所帶來的衝激，尤其是在 19 世紀中期中國出生的華人移民日漸增多，為便於溝通、鞏固通商網絡，一些峇峇「重拾」漢語，尤其 Holo 話，也唯有如此，他們才能真正參與當地華人社團（如會館、宗親會），甚至領導群倫。只是，從整體來看，這種情況在峇峇社會中仍算少數，尤其隨著第三代的出現，對「祖源地」的疏離，加上英語教育的繁盛及功利性，事實上直到 19 世紀末，峇峇社會中能懂「福建話」的可說少之又少。然而，這只是偏南的馬六甲與新加坡的情形。而移居北部的檳城峇峇，因當地民族結構的不同，則衍生出另一種「語言格局」。

二、峇峇福建話

檳榔嶼於 1786 年開埠，1826 進入海峽殖民地時期，許多峇峇從馬六甲移入。然而，由於英國殖民者大量引入華工的結果，檳城的非峇峇華人非常多，而馬來人則非常少，從表 1-5 我們可以看到，檳城 1871-1901 年的中國移民持續佔有超過一半（>50%）的人口，直到 1947 年，檳城市內的中國移民人口甚至佔了超過七成的比例。再看表 1-6 的「僑生」比例，1881 年佔 20%，1891 年佔 23%，1901 年雖增加到 26%，但比例上仍比「新客華人」少將近三成。從這樣的人口佈局看，我們不難想像，檳城開發後移居當地的峇峇，很容易便被吸入到當地華人社群裡。

表 1-5：擁有 30%以上中國人口的三州府

年代	31%~50%	51%~70%	71%以上
1871		P, S	
1881		P, S	
1891		M 市, P, S	
1901		M 市, P	S, S 市
1911	M 市, P	P 市, S	S 市
1921	P	M 市, P 市	S, S 市
1931	M, P	P 市	M 市; S, S 市
1947	P 縣		M 市; P 市; S, S 市

資料引自：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53。

表 1-6：檳、甲、新「方言群」人口所佔百分比

方言群	1881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僑生	20	27	11	23	28	9	26	26	-	-	-	-	-	-	-	-	-	-	-	-
福建人	30	22	37	32	26	36	35	29	44	60	32	44	53	40	43	45	40	42	43	39
廣東人	20	7	21	23	7	19	22	7	23	24	9	25	27	13	22	22	11	23	22	14
潮州人	11	4	18	12	5	17	7	3	18	6	7	17	6	5	20	6	6	23	8	8
海南人	9	26	7	3	24	6	3	23	5	3	34	5	3	22	5	3	16	7	4	12
客家人	10	15	6	7	12	5	7	10	1	6	16	5	9	19	5	10	23	6	9	24

資料引自：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71。

再來看各個語言族團的人口比例(表 1-6)，從 1881 年到 1947 年操福建話的人口一直都佔有最大的比率，尤其在 1911 年，其人口佔有率更高達 60%，之後佔有比例雖有微幅下降，但佔有率始終徘徊在五成左右，反觀操其他語言的人口，如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及海南人，其人口數的增減幅度始終是非常小的，並沒有出現如福建人般在 1911 年的比率暴漲。當然，我們不排除 1911 年福建人口的大幅增長是由於普查方式的改變，有近 3 成的「僑生」人口被併入「福建人」的可能性，但這樣的數字改變正好也凸顯了一些現象。首先，既然說是以「方言」為統計原則，「僑生」的被併入「福建人」，正好說明了檳城「僑生」的峇峇馬來語逐漸淡化，以致人口統計時讓外人看不到這群僑生特有的語言界線；而峇峇馬來語的淡化也就表示峇峇的語言已被其他族團的語言所涵化。次之，從福建人口佔多數比例的具體事實看，再到「僑生」人口被併入「福建人」人口的猜測看，我們有理由相信，直到 1911 年，檳城的峇峇至少在語言上已被「福建人」所「同化」了。畢竟峇峇文化裡有太多福建文化元素，因此一旦碰上強勢的「純福建人」，彼此之間的那一點「靈犀」必一點就通，「涵化」現象的發生其實一點也不難。

因此，檳城峇峇除了講峇峇馬來語，也講福建話，兩者相處日久，語言逐漸受到涵化，峇峇馬來語漸漸消失，而為非峇峇華人的福建話所同化，僅留下峇峇的口音及詞語（實為馬來詞語），成為今日的「峇峇福建話」。峇峇福建話的屬性，在語法和語音上，主要偏 Holo 語，但詞彙上，則夾雜了許多馬來詞彙。其與峇峇馬來語的區別，可透過以下公式瞭解：

峇峇馬來語 = 混雜馬來語（主） + Holo 語（主） + 其他外語（輔）

VS

峇峇福建話 = 檳城福建話（主） + 峇峇馬來話（輔） + 其他外語（輔）

實際上，在今天華人人口佔將近七成的檳城，峇峇福建話幾乎與檳城福建話融為一體，唯一差的別在於受馬來語影響的深淺，語言中混雜馬來語詞彙的多寡。此

外，正如前文所說，檳城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特別多，很多華人在家出外都習慣性講英語，峇峇人當然也不例外，因此，峇峇福建話某程度上也受英語影響。

既然檳城的華人人口那麼多，早期的漢語私塾當然也不會少，檳城峇峇被「福建話」涵化，是否意味著語言也完全改成「福建話」呢？其實不然。整體上，由於早期的私塾學堂無論在設備或課程上都過於簡陋、不切實際，並且長期停留在「啓蒙教育」的階段，許多峇峇父母必不可免的要把孩子送到英校去接受完整的教育，學習實用的英語。曾於 1886 年（清光緒十二年）訪問新加坡的鄒代鈞，曾在其著作《西征紀程》回憶道：

華人居此者，閩籍居其七，粵籍居其三，多擁厚貲為富貴，置業傳子孫，英人歲稅之，其衣冠語言、禮儀風俗，尚守華制，惜文教未興，子弟之聰俊者皆入西塾，通西文，聖經賢傳竟不與目。……⁶⁴

此外，《叻報》1889 年元月 19 日的〈社論〉也評道：

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誦習英文，而于華文一端，轉從其略。今日之英文，固為時尚，有志者不可以不學，然身為華人，則當為之兼習中西文字，固不宜徒習西文也。

轉入本世紀初期，1909 年抵新的薩君陸在考察當地學務後，則報告道：

各種社會，一切習慣，率用巫語；而生長此地者，復以中國言文為無用……業商之人為保護個人財產計，為內地行動自由計，為馳赴荷屬、法屬各島一身護符計，不得不入英籍，以商業應用或學英語，或習英文不願歸國，遂視吾國普通教育為不重……⁶⁵

總而言之，十九世紀下半葉，華人私塾學堂雖普遍存在于華族聚居的城鎮，但相較於英文學塾的蒸蒸日上，漢語私塾學堂的教育始終是停滯不前，上文薩君陸等人的評論，便是這種情況的最佳註腳。因此，儘管早期的私塾教育使峇峇不至於完全和「祖先的語言」失去聯絡，但實質上，這類教育對於峇峇的語言使用影響性不大，真正衝擊「峇峇馬來語」的，仍是英語的入侵。出生峇峇的陳省堂在 1894 便曾慨嘆道：

蓋南洋子弟多不欲講究華書，而好攻西文，間有精于西文者，則重西教而輕華教；學之未至者，則其心無所主，是以為人所愚，而以毛亞抹怒為千古第一救世之聖人，竟不知我國歷代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何人也。跡其所為，恆有忘本悖理之事。嗟乎！世風日下，可勝嘆哉！尚冀為人父兄者，教其子弟學西文，亦當讀華書，使其心有所歸，不致化為楊墨，則華人幸甚！風俗幸甚！⁶⁶

⁶⁴ 鄒氏，新化人，候選知縣，引文自其著《西征紀程》。另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 34。

⁶⁵ 引自薩君陸〈調查南洋學務報告〉，收入《福建教育官報》第二十二期，宣統二年七月，頁 3。

⁶⁶ 引自陳省堂，〈祀非其鬼〉（原載《星報》，1894.03.30），見葉鐘鈴編，《陳省堂文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頁 103。

第三節 英語

峇峇社會的英語使用情形，起源英國殖民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及西方人的傳教活動。首先，爲了安撫馬來貴族階級，英國統治者實行「雙語政策」，承認馬來語享有與英語一樣的「官方語言」地位，以維護馬來人在政治、經濟及教育上的特權，並撥款建立馬來語學校，但實質上這些輔助只到小學教育的階段，對於馬來教育，殖民者的基本態度僅僅是「培育馬來農（漁）民成爲更好的農（漁）民」，並且，馬來學校的基本課程主要是學習書寫馬來文和阿拉伯字母、背誦可蘭經文（Koran）等⁶⁷，著重馬來社會的文化知識灌輸，因此馬來學校一般都只招收馬來子弟，並不對外族開放。至於華文及淡米爾語學校，殖民者雖允許這類學校的存在，卻採取「放牛吃草」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滅。反觀英語教育，政府不僅積極建立英語學校，後期並津貼教會學校，甚至設立獎學金，例如「女皇獎學金」（Queen's Scholarship），培養更多具備英語能力的專業人才，以輔助殖民者的統治⁶⁸。由英國殖民政府所資助的英語學校類型爲「大英義學」（free schools），另外一型則是由傳教人士所私立的「教會學校」（mission school）⁶⁹。基本上，英語學校多半設立於城鎮地區，由於峇峇多住在城市或近郊，因此要讓孩子受教育，峇峇父母們也就順理成章的把孩子送入英校，而早期對峇峇社會文化及認同影響深巨的英語學校，主要包括了以下五間。（見表 1-7）

表 1-7：海峽殖民地時期設立的英語學校

年代	學校	地點	備註
1814	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	馬六甲	
1816	檳城義學（Penang Free School）	檳城	
1823	新加坡學院（Singapore Institute）	新加坡	於 1867 年改稱 Raffles Institute
1826	馬六甲義學（Malacca Free School）	馬六甲	自 1867 改稱 Malacca High School
1899	新加坡華人女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新加坡	第一間女子學校

以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爲例，直到 1920 年代，它已成功培育出許多「雙語娘惹」，除了峇峇馬來語，也能掌握英語。筆者根據《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書內所附載的兩張該校師生的照片估算學生人數（見圖 1-III & 圖 1-IV），1900 有學生約 33 人，

⁶⁷ T. 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iz. Penang and Singapore, with a history of the Malay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839)), vol. 1, p. 171.

⁶⁸ 「女皇獎學金」（Queen's Scholarship），爲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爲當地學生頒發的獎學金。於 1885 年海峽殖民地代理總都史密斯爲紀念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而倡設。1910 年曾停頒，1929 年復頒，1939 年起只頒給新加坡萊佛士書院及英王愛德華七世醫學院畢業生。（參東南亞歷史詞典編輯委員會，《東南亞歷史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頁 23-24。）

⁶⁹ 參見葉玉賢，《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 13-14。

1913 年則已增長到 114 人左右⁷⁰。娘惹的英語到底好到甚麼程度呢？以 1917 年成立的華人婦女協會 (Chinese Ladies' Association) 首任會長李俊源夫人 (Mrs. Lee Choon Guan) 爲例，「她能夠流利自如地用英語談論任何有趣的事情……對西方音樂尤爲愛好。」⁷¹可見改變的不只是語用狀況，也包括了娘惹們的生活品味。

圖 1-III：新加坡華人女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00)



FIRST YEAR OF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00).

資料來源：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1923;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04.

圖 1-IV：新加坡華人女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13)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13).

資料來源：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1923;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05.

⁷⁰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23), pp. 304-305.

⁷¹ 李俊源夫人 (1877-1978)，原名：Tan Teck Neo (陳德娘，音譯)，爲富商陳恭錫之女，是唯一獲英王頒大英帝國勳章的華人女性。詳見Herbie Lim Eng Kwan, 'Mandalay Villa: Memories of a Peranakan Mansion', in *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8), pp. 25-31; 另見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中譯本](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版)，頁 446-447。

從工具論的角度看，英語作為統治階級的語言，無疑的是權力地位的象徵，接受英文教育，能掌握英語，也就意味著向上層階級晉升。弗里曼曾說，十九世紀的峇峇華人成為華人社會的「優越階層」(Superior Stratum)，在經濟與政治上支配著海峽殖民地的華人社會⁷²。自十九世紀接受英語教育開始，英語的掌握不僅使峇峇商人們左右逢源，也造就了許多專業人才以及在外商公司就業的機會。此外，在政治上，鑑於這群人的雙語能力，能直接以英語溝通，殖民政府承認峇峇股商及領袖們在當地華人社會中的代表地位，甚至委任他們為立法議員、市政委員或其他與華民事務相關的行政單位的職員。因英語而帶來的這種政經優勢，使峇峇人逐漸傾向於英國認同，並自認是「英皇的子民」。

既有認同，則必然會牽涉到歸屬感的問題。如從語言情感依附的層面看，早期峇峇家庭把孩子送返中國唸書，或請「先生」教導孩子漢語的情形雖時有所聞⁷³，然而，隨著第一、第二代峇峇的逝世，被涵化愈深的第三、四代峇峇和中華文化的關係已越見淡漠，讓孩子受漢語教育的情形也日漸銳減。漢語教育的疏遠無形中造成對英語教育的親近，隨著英語的掌握能力越高，在峇峇社會中的使用面越廣，峇峇社會文化被涵化的情況就越不可避免，正如Felix Chia所說：「在嘗到學會英語的甜頭之餘，峇峇隨後必須面對太靠近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⁷⁴從19世紀開始直到現在，我們必須承認，西方文化已成為峇峇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從這點也清楚讓我們看到，英語所帶來的峇峇西化程度有多深，而這正是「殖民化教育」所帶來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對於英國「宗主國」的認同，對西方文化生活的認可。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英語儘管非峇峇的母語，仍只是峇峇社會的第二語言，但大部分在英語教育及環境中成長的峇峇，其實已經峇峇馬來語、英語不分了。

二戰後峇峇馬來語的沒落，則讓英語在峇峇社會中的地位急速提升，成為生活中的第一語言⁷⁵。2002年年底，馬來西亞檳城的華人政壇，便曾上演一場「娘惹的母語？」的爭議，當時的柑仔園州議員林武燦，嚴厲批評檳州旅遊、文化及藝術委員會主席拿督紀碧真「不懂中文，有損尊嚴」，而拿督紀碧真在回應這類

⁷² Maurice Freedma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65), p. 11.

⁷³ 例如，林文慶便曾提及峇峇男孩被送回（中）國受教育之事。而陳達也有報告說，當初中國南部的外移村有華僑所辦的學校，其中有很多有馬來血統的男孩在那兒求學。詳見：Lim Boon Keng, "The Chinese in Malaya", in *Present Day Impression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ed., W. Feldwick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Co., 1917), p. 876;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MS Press, 1978 (1939)), p.143.

⁷⁴ 意譯。引自：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 83.

⁷⁵ 例如，Dianna Ooi在1967年曾作的一項關於檳城說英語華人的研究，發現檳城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特別多，甚至有很多華人在家出外都習慣講英語。而這類型「講英語的華人」(English-Speaking Chinese)人口中，多數是「海峽華人」。(參見Dianna Ooi, *A Stud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Chinese of Penang 1900-1941*, M. A. thesis, Universiti Malaya, 1967.)

「華族中心主義」言論時，便強調：

身為娘惹與峇峇的後裔，我的母語是英文，英文以外，我也會講檳城福建話。我是不懂中文，我的英文是有國際水平的，我到很多國家都被認同，還到世界各地給講座。⁷⁶

由此可見，英語經歷了「第二語言期」、「互補期」，直至現在，峇峇馬來語雖仍然作為峇峇認同的重要指標，實則已「名存實亡」，在大部分峇峇的實際生活中，英語已成了從小就開始習用的「母語」。

第四節 華語

「華人與峇峇只是一線之差——很重要的一個分際，就是華人懂得華文華語。」⁷⁷長久以來，這種既是外部也是內部的觀點，為我們塑造了這樣一個印象：「峇峇不懂得華文華語。」是事實嗎？某個程度上來說，確實如此。但這樣的想法也過於以偏蓋全，峇峇與「華語」的關係並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在普遍的峇峇馬來語及英語群中，其實還是有一些接觸過華語的特例。但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經驗絕對是建立在雙語或多語的基礎上，而「華語」的地位也始終是處於「外語」或「附加」的位階。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清廷面對內憂外患、經濟困頓的壓力，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財政支援，於是一改先前的拋棄、嚴禁為懷柔、保護近乎利用的政策，並以新加坡為起點，設置領事處，也間接把中國的「官話」零星帶到新馬地區。但真正的移置，則始於 1904 年（光緒三十年）第一間新式華校——「中華學校」在檳城的設立⁷⁸。從該校的課程綱要瞭解，該校的語言課每周教授 6 小時的英語和 8 小時的「國語」⁷⁹，而這裡所謂的「國語」，則必定是當時中國的國語——「官話」。簡言之，從 1900 年開始，由康有為領導的保皇維新派，以及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相繼抵達新馬地區，雖然兩者訴求有異，但過程中都同樣以灌輸民族意識、鼓吹對中國及中華文化的認同為手段，以致當地華社紛紛響應，開始積極推廣華語教學。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新馬華社直接受到這股革新浪潮鼓舞，民間或自資興辦、或將原有的私塾學堂改為新式的華語學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新式華語學校已漸漸取代舊式私塾教育，並在

⁷⁶ 參見〈紀碧真促檳州議員勿在議會挑中文課題〉，刊於《星洲日報》，馬來西亞，2002 年 11 月 16 日；〈紀碧真重申：我的母語是福建語和英語〉，刊於《星洲日報》，馬來西亞，2002 年 11 月 19 日。

⁷⁷ 文引自張木欽，《荷蘭街口夕陽斜——峇峇文化：一次文化統合的奇異經驗》（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頁 21。張氏的說法可代表「外部觀點」，而「內部觀點」主要建基於筆者的田調訪談上（2003 年 3 月及 2003 年 11 月），所有的峇峇報導人在談及「峇峇的語言」時，第一反映會提及“Baba Malay, English and little bit Hokkien”，但沒有人會提及“Mandarin”。

⁷⁸ 張弼士為中華學校的創辦人之一，關於中華學校的設立，可參見鄭國祥，〈張弼士其人〉，《檳城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1958），頁 97-107。另見迦陵生撰，〈張弼士與檳城文化教育〉，收入《南洋文摘》第一卷第二十一期（新加坡：世界書局，1960），頁 37。

⁷⁹ 參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 101。

戰後於華族內部與英語教育相互抗衡。

然而非常弔詭的，其實「華語」歸根就底乃是外來的異族語言，但在整個華語教育的發展路上，「番化」的峇峇不僅受到孫中山等人「血濃於水」、「四海歸心」的感召，甚至還身體力行，帶頭推動華語教育。此話怎講呢？在前面（第一章，第一節之三），筆者便有提到，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峇峇的教育語言論辯中，便有一派「華語派」認為峇峇應該學習華語，且有必要以原文及華語教導中國文學，馬來語無法讓人體會華人文學的奧妙，其中代表人物有林文慶、龔振英（音譯，Kiong Chin Eng）、蕭保齡（音譯，Seow Poh Leng）、黃獻文（音譯，Wee Hean Boon）及伍連德等人⁸⁰。在林文慶提倡的海峽華人改革運動中，華語華文的提倡是其教育改革的一環，被認為是英語教育以外必須被重視的「母語教育」。從林文慶的著作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他對華語的提倡主要也是從語言的「感情依附」及「工具依附」作用這兩個角度來看的。首先，站在「民族情感」的角度，林氏認為，失根的民族不可能昌盛，在海峽殖民地，馬來人以馬來語為母語，統治者以英語為教育媒介語，華人處於異族之間，倘若不想被淹沒，就得為孩子們安排華語課程。「華族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的民族之一，子孫不能坐視祖先這美妙的語言在他們當中消失，每一位不諳華語的海峽華人應感到慚愧，……更何況它涵容了我們祖先最優秀的傳統。」他同意華人必須通曉中英雙語，但要先學習華文⁸¹。其次站在工具論的角度，他認為華語文是一種普及性極高的語言，中國有近三億人使用華語，並且語、文統一，當華語文字化時，就連日本、韓國及越南等繼承中國文明的地區都能明瞭。海峽華人當終究存在五、六種不同的「方言」，如能掌握華語，將來孩子們就能有共通的語言文字相互溝通。此外，支持學習華語的峇峇也認為，除了做為歐洲人與馬來人之間的仲介，在國內華語的掌握亦有利於峇峇進一步扮演講英語的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中間人角色。與此同時，也可應合當時中國需要大量翻譯人才及外語教師的需求⁸²。

⁸⁰ 參見Kiong Chin Eng,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3), 1907, pp. 105-108; Seow Poh Leng, "Education in the Colony",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1, 2), 1904, pp. 11-17, 69-7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1984)), p. 103, 黃獻文為第四代潮州峇峇。

⁸¹ 參見Lim Boon Keng, "Our Enemie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June, 1897, p. 55;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 Kung Chi Chi's Protest",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5, No. 18, June, 1901, p. 67. 當然，諸如林文慶等人把華語看成是民族語言、民族情感的依歸，筆者認為某程度上是受十九世紀末南來宣導政治理念、民族思想的中國維新派及其後革命派人士的「誤導」。

⁸² 參見Lim Boon Keng, "Straits Chinese Reform 3: Th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3, No. 11, Sept., 1899, pp. 104-105; Anonymous, "Editorial: Female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2), 1907, p. 43. 由於能掌握多種語言，早期東南亞有許多華人曾到中國從事翻譯的工作，來自新、馬可考的包括邱文川、吳文修（Ng Mun Siew）、辜鴻銘（曾在清朝高官張之洞手下工作）等人，又如林則徐治粵其間的幾位翻譯員，也多是來自南洋。*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June, 1837, p. 15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June, 1839, p. 77. 轉見梁元生，〈李清輝與〈東遊紀略〉：百年前一個新加坡人訪問中國的記錄〉，載於《南洋學報》，第三十九卷第一、二期，1984，頁38；梁文附錄：李清輝，〈東遊紀略〉（原載於《叻報》，1889年2月16日，第2166期，頁5），頁41。

基於以上提倡華語教育的理念，1898年開始，峇峇林文慶便先後在自家、威基利俱樂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和英華義學(Anglo-Chinese Free School)開設華語學習班，教授峇峇子弟「官話」。此外，在中國領事館的協助下，他也分別在中國領事館及華人體育協會開辦華語夜班。關於當時在寓所開班教學的情況，其中一位學生曾回憶道：

every Sunday evening one could see a good number of Chinese Babas wending their way to the doctor's house with the earnest desire of being initiated into the mystery of this new language...⁸³

(譯文：在每個星期天的黃昏，我們可以看到好一群人，帶著一種對新語言求知的渴望，湧向(林)博士的家……)

可見當時這個來自「祖源地」的新語言，對峇峇來說還算是頗具吸引力的。從開創性來看，林氏在新加坡開設華語班的時間，比我們之前所提的第一間新式華校的成立(1904年)還早了5年，並且也由於林文慶的積極推廣，新加坡乃至檳城、爪哇等地的華人學校也開始成立新式華校或增設華語教學；如果說，峇峇才是新馬地區華語教育的拓荒者，這其實一點也不為過。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提倡華語的林文慶同時也堅信：「好的英語教育，無庸置疑是所有在大英帝國的華人或其他民族父母留給孩子們的最佳遺產。」⁸⁴，明顯的，華語仍只是在英語教語許可的情況下的附庸教育，例如新加坡華人女校，在1899年籌辦之初，雖然也有華語課程的設計，最後也都因華語的沒有「市場」而草草收場。因此，延伸到執行面看，華語雖基於民族情感及實用性的理由被小部分與中華文化較親近的峇峇所提倡，但華語實質上並沒有因此打入峇峇的生活核心。從當時整個「重英輕華」的現實情況、華社各漢系民族各說各話、「華語」在當地民間的使用度微乎其微⁸⁵、以及峇峇對這外國「官話」無論在語或文上的完全陌生、乃至峇峇生活重心侷限於馬來群島無須仰賴到中國發展等角度看，華語何以長期在峇峇社會中疲弱不振，就一點也不難理解了。

固然，戰前由於認同和文化模式的差異，也有峇峇反對中文教育，但20世紀二戰後峇峇已抵擋不住來自非峇峇華人的壓力，加上因不會講漢語而被非峇峇華人和他族取笑，不得不傾向非峇峇華人的文化模式，開始察覺學習漢語的必要性。而20世紀大量冒出由華人移民開辦的華校，也使峇峇有機會讓子女受華文教育。然而，整體而言，大部分的峇峇仍然送子女入英校，只有少部分將子女送

⁸³ 引自Kiong Chin Eng,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3), 1907, p. 107.

⁸⁴ 筆者譯文，原文引自 Lim Boon Keng, "Our Enemie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June, 1897, p. 54。

⁸⁵ 關於華語在海峽殖民地的普及程度，在馬華中被尊為「華教鬥士」——沈慕羽的回憶，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註腳：「戰前的馬六甲，流通於華人社會的語言是福建話。福建話就是普通話，能聽華語的少之又少，更無論會講華語了。記得有些從中國來的官員，在發表演說時，要通過翻譯成福建話；抗戰時期，佛教訪問團到馬六甲……慈航法師在青雲亭弘法時，我用福建話翻譯出來……」(參見沈慕羽，〈六二回顧，細說從頭〉，收入《晨鐘夜學六二回顧特輯》，1995，頁9。)，華語在純華社尚且不通行，就罔論已涵化的峇峇華人了。

入華校和馬來學校。

言及於此，我想，我們已經破除了長久以來駐守在「純」華人心中的一個迷思，或說已成了「純華人」坊間流傳的一個「神話」：「峇峇人講『番仔話』，不會講唐人話。」這「神話」最後被有心者利用，作為攻擊他們「背祖忘宗」的藉口。事實上峇峇真的不會講「唐人話」嗎？從第二節及本節的討論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會講「漢語」的事實存在，只是人數不多，「漢語」也不被峇峇人重視，造成「講漢語」的實例常常被忽略，而留下「峇峇人不會講漢語」的刻板印象。當然，必須釐清的是，從整個峇峇語用歷史來看，要用「華語」這外來「官話」套用到峇峇身上，以「民族語言」的標準，去要求他們「回歸」此一「民族特徵」，以宣示他們的華人「民族屬性」，說實在的，真的是非常勉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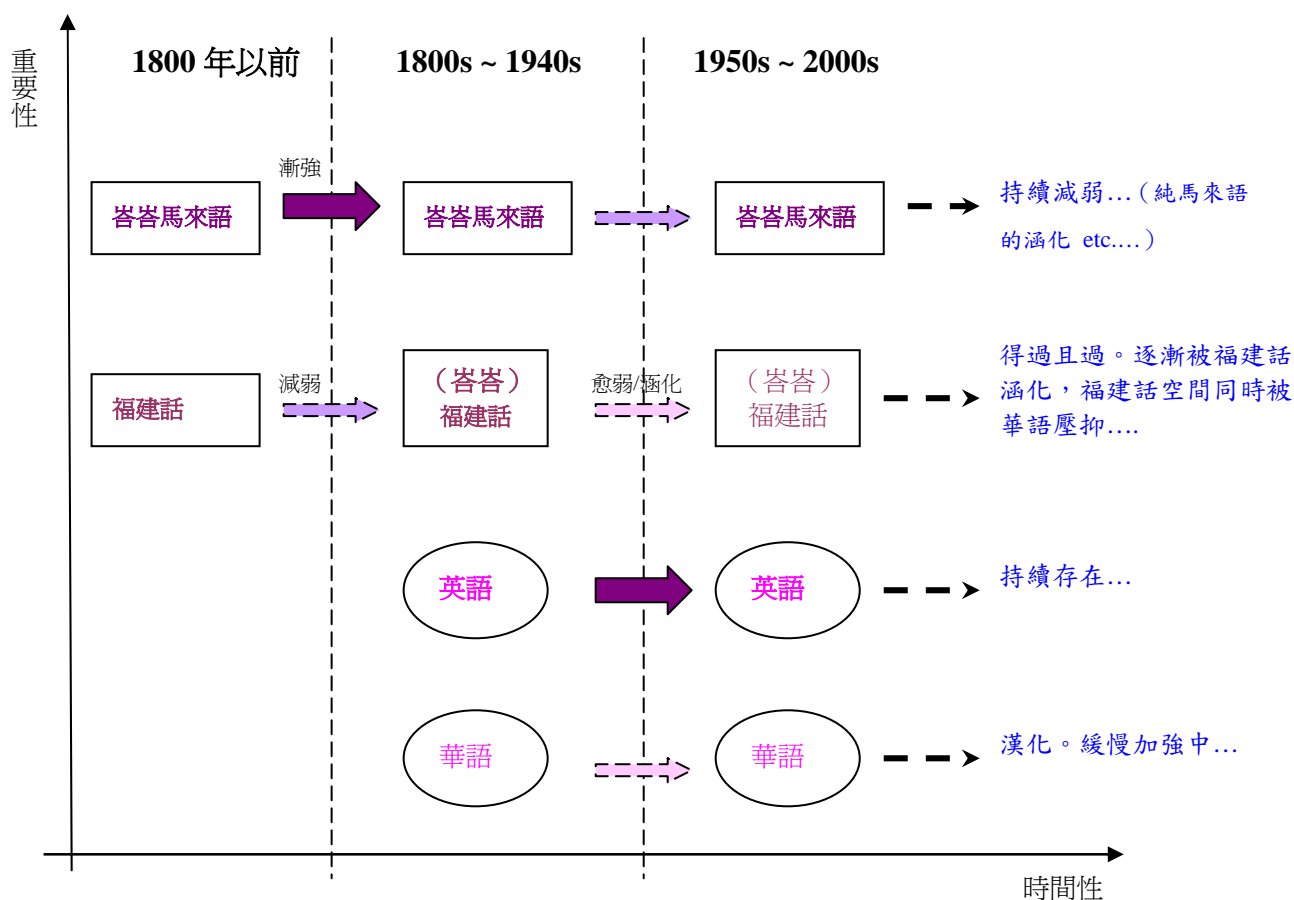
小結：

峇峇馬來語在長期自由放任的漢巫接觸下，至少於 18 世紀誕生並在 19 世紀隨著峇峇人經濟地位的提高與擴展而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峇峇的語言使用出現變化，主要 18 世紀末期在英國殖民者到來以後。19 世紀中葉英國人為拼經濟，不斷從中國及印度引進大量外勞，則造成了三地人口結構的迅速變化；非峇峇華人的湧現與壯大帶來衝擊，加上為配合殖民者利益而推行的教育政策，尤其英語教育的推展，則漸進而深入的改變了峇峇人的語言習慣。

日本佔領新馬時期（1942-1945）則是另一個轉捩點；日本人對華人的仇視與皇民化政策，對峇峇的社會文化而言是嚴重的摧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馬來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浮現、英國殖民者漸漸親馬來民族的政策、非峇峇華人的社會與經濟力量的超越，乃至獨立後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兩國的教育政策等各種因素的牽引，在在都對峇峇的語言及認同產生另一次變革性的影響。

從整體歷史背景看，峇峇人的語言發展史，是多元糾纏而富戲劇性變化的。因此筆者認為，要談峇峇人的語言使用情形，除了專注於其「母語」（峇峇馬來語）外，也不應忽略對馬來語（Bahasa Melayu）、英語，華語及其他所謂漢語方言（如福建話、廣東話等）的觀照。從以上的討論，筆者僅以以下圖示（圖 1-V），觀測峇峇語言使用的發展與未來走向：

圖 1-V：峇峇語言使用的發展與未來走向⁸⁶



備註：

□ 具（峇峇）民族屬性的語言

○ 外來語

➡ 語言的使用性漸強

➡ ➡ 語言的使用性漸（/愈）弱

➡ ➡ 未來的發展性

⁸⁶ 表中將不列馬來語，主要是由於馬來語是馬來人的民族語言，其與他族的界線分明，並不如英語般中性，跨越各族。儘管新、馬獨立後，（尤其馬來西亞）華人已能更好的掌握馬來語，且未來華人的馬來語會話與書寫能力勢必將大幅提昇，但是，華人雖承認掌握馬來語的重要性，同時也認可英文很重要，但華人仍期望孩子們都懂得閱讀和書寫華文。換句話說，華語（次之為其他漢系語言）是華族在多元民族社會裡最重要的認同標誌，以馬來西亞為例，在民族政治的氛圍下，華（語）文及捍衛漢文化，與華人認同之間的關係，是驅動華人政治支持的決定性元素。因此，就語言上，要華人跨入內部之間講馬來語的境界，在現代處處民族主義的年代，其實是需要無比的勇氣，甚至有能背負「背祖忘宗」罪名的能耐，被認為具有華族屬性的峇峇也如此，儘管他們講峇峇馬來語，要操「標準馬來語」也沒問題，但基本上族團內部仍沒有以「純馬來語」溝通的習慣，有鑑於此，本表將只列峇峇語用上四種內外部兼用的語言。